



# 西藏通訊

總第100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四年三月至六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ཛིན།

TIBET BULLETIN 2014



## 藏人行政中央推动「中间道路」运动

བོད་ཀྱི་ལོ་ ༡༩༩༩ རབ་བྱུང་རི་ཁྲི་ཤིང་ན་ས་ག་ཟླ་བ། ༥་རམ་ས་ལ།

#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四年三、六月號(總第100期) 特刊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代表本刊的立場

## 目錄

- |  |   |
|--|---|
| 1. 主編的話                                    | 14. 十七條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劉璐                   |
| 2. 「中間道路」是互利之路——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弘法時的講話——藏人行政中央 | 16. 「中間道路」是雙贏之路——李江琳                      |
| 4. 藏人行政中央的核心政策——藏人行政中央                     | 18. 「中間道路」是化解民族矛盾的良方——張菁                  |
| 6. 「中間道路」的發展年表——藏人行政中央                     | 19. 非暴力的美德——我所見到的達賴喇嘛——秦偉平                |
| 7. 關於「中間道路」的常見問題——藏人行政中央                   | 21. 「中間道路」的本質、歷程及其成果——藏人行政中央              |
| 10. 為什麼「中間道路」？為什麼非暴力？——胡平                  | 22. 專訪達賴喇嘛中文秘書才嘉——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到底是什麼？——美國之音中文部 |
| 11. 怎樣理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丁一夫                   | 26. 「中間道路」的本質、歷程及其成果（上接21頁）——藏人行政中央       |
| 12. 我為「中間道路」叫好——田牧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 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 +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 +91-1892-224957

E-mail: [chinadesk@tibet.net](mailto:chinadesk@tibet.net)

## 主編的話

早在1974年，達賴喇嘛尊者就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為未來與中國對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果然，五年後即1979年，鄧小平主動提出與嘉洛頓珠啦見面，開誠佈公：“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至此，藏中雙方的對話條件，已成熟。

不幸的是，左傾思路後來主導了中國政局，對西藏的壓迫，日甚一日，因此，2008年3月，西藏三區爆發了全民抗暴。為了欺騙國際輿論和上演北京奧運，中國政府不得不展開，與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會談，但是，自始至終，中國擺出的都是一付以強壓弱的帝國架式。

而中國統戰部某極左官員，還把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歪解成“西藏獨立分兩步走”，甚至公然否定鄧小平有關西藏問題的言論。這種不敢面對現實，胡攪蠻纏的作法，事實上，就是既不想解決西藏問題，還要把責任推給西藏方面的信號，毫無理性地踐踏了西藏方面的誠意，實在有失大國風度。

強硬的對藏政策，使西藏人民的壓迫更加深重。有目共

睹，近年來，中國當局不擇手段地加緊壓制藏傳佛教、無度地採礦和截流、削弱藏語教學、大量移民，並且，各種監視與管控無孔不入，正在是這種情況下，從2009年起，西藏人民展開了更加慘烈的政治抗議——自焚！這也是2008年3月遍及全藏地的群體抗議的延續。

中國還將在西藏製造出多少醜聞？這種惡性循環還將持續多久？

無須迴避，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達賴喇嘛尊者已經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拿了出來，就是“中間道路”。今天，儘管西藏人民經歷了被殖民、被殘暴的巨大災難，但是我們仍然堅這個雙方的互利原則。

那麼，究竟什麼是“中間道路”？達賴喇嘛尊者有哪些關於“中間道路”的講話？廣大的漢藏知識分子是怎樣理解“中間道路”的？前景如何？正是這一期《西藏通訊》第一百期特刊，將與諸位讀者同共探討的問題。

## 「中間道路」 是互利之路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弘法時的講話

文/藏人行政中央

2013年3月29日，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薩路噶（Salugara）弘法的最後一天，向民眾發表的講話指出解決西藏問題「中間道路」是互利、雙贏的政策。

今天，這裡聚集了噶倫堡、大吉嶺和錫金的不少流亡藏人，有的祖輩就居住在了這裡的藏人，我們叫“甲噶康巴”，除了來這裡的時間不同以外，我們的根都是血脈相連的，我也是你們中的一員。

兩年前，我不僅在政治上讓自己退了休，也終結了自五世達賴喇嘛開始的，延續了近四百年的由歷代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的製度。雖然在當時，這個制度是符合社會要求的，但今天已時過境遷。未來，當境內外團聚的時候，我也會像很早以前講的那樣，將不擔任任何職務。就是達賴喇嘛體制是否存在、延續，也會由那個時候的人民做出決定，這個話，我在1969年就說過了。

十二年前，即2001，我們的政治領袖由選舉產生了，我已處於半退休狀態。兩年前，選舉噶倫赤巴的時候，世界各地的藏人，都非常重視，擔負起了很好的責任，我看到完全退休的時刻到了。所以，噶丹頗章承擔政治責任的製度，不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結束的，而是高高興興地，在沒有任何人要求的前提下，自願地結束了。正如藏人習慣說的，“吉祥的時間，吉祥的方式”，“扎西得勒”地結束了。印度、美國，以及其他我認識的很多官員，都對我的決定表示肯定，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只是，在我們藏人中間，顯得突然，有點不習慣，但是，說明後，大家就理解了。

現在，是真正地在民主之路上，為自由而奮鬥，所以我們的力量在增大，而且，給了世界更多的支持我們的機會。不像“老狗守著骨頭”似的固守於舊的製度，而是適時地改革，也得到了不少益處。我作出這樣的決定，並非失去信心，並非西藏問題沒有希望，不是這樣的，請你們放心。

西藏的奮鬥不是為了個別人的利益，而是整個西藏廣大人民的正義鬥爭，重要是境內的廣大人民。過去，我常說，我是境內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而不是發號施令者。我向世界介紹境內廣大人民的心願是什麼和那裡的真實情況，這是我的責任。最主要的是境內廣大人民至今都

有著驚人的勇氣和信心。

之前，噶丹頗章的範圍僅僅是衛藏、多堆（康區）的金沙江兩岸，當今，康區、安多和衛藏全部統一的想法，非常強大。在七、八、九世紀，整個西藏三區，可以說是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後來，西藏出現了分裂格局，雖然在宗教和文化上仍然是統一的，但政治上已非常虛弱，現在，由於內外的眾多因素，全體西藏團結在了一起，民族意識增強，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非常關注。

我們流亡五十多年，依靠大家牢固的勇氣和真誠，克服了重重困難，使今天，在眾多的流亡者中，我們獨樹一幟。這不需要我們解釋，很多了解藏人和研究流亡的人士，都這樣表述過。這主要是因為廣大人民的信心和勇氣克服了種種困難的成果。感謝今天在這裡的噶倫堡、大吉嶺、甘托克三地的藏人，我衷心地感謝你們付出的努力。

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互利的「中間道路」，1978年年底和1979年，與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政府有了直接聯繫。當時，我們已經內定了這個互利的政策，所以，跟中國政府接觸起來非常方便。

中國境內，如80年代開始民主運動時，採取了全面的強硬政策，對西藏也自然是強硬的。但是，在胡耀邦時期，真的有很大的希望，不過，胡耀邦被迫辭職，接下來趙紫陽也沒能留任，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中國政府接觸，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同時在西藏境內由於絕望，前後發生了多次起義和抗議事件，都被悲慘地鎮壓了。

但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特別是2008年之後，我見了很多華人，其中有知識分子和學生等數千人，他們中，有的是在美國和歐洲留學的中國人，還有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組織了一些專門的會議，在向他們介紹“「中間道路」”的時候，都非常歡迎。總之，支持「中間道路」的華人力量很大。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漢人手寫的信，他是一位知識分子，寫道，之前，他認為達賴喇嘛雖然是一位宗教領袖，但在政治上是個分裂者，不過，有一次他去五台山朝聖，遇到一位

從印度來的漢語講得很好的僧人，向他介紹“「中間道路」”的內容之後，他說，達賴喇嘛的這個互利、雙贏的政策，會得到所有中國人百分之百的支持。這封信裡是這樣寫的，這是事實。

在過去的幾年裡，很多華人跟我會面時，都非常贊同「中間道路」是互利之路，認為對中國有益，非常支持。但是從中國政府層面上看，至今沒有任何動靜。不過，政府和人民哪個重要？當然人民更重要。雖然在專制政權下政府很有權威，但從長遠看，還是人民更重要。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說“「中間道路」”時，受到中國人民，尤其是很多知識分子的支持，比如劉曉波，還有現在在美國的很多民主人士見我的時候，都非常支持。更重要的是，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如作家、藝術家、教師等，很多，見我時，雖然大家的心裡都有獨立的意願，但是，當我們考慮到能否取得成果時，就感到雙贏的“「中間道路」”是有道理的，並且，可以很好的解釋給漢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支持。我見到的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說要走西藏獨立道路的，雖然我們有這個權利。

在七、八、九世紀的時候，情況非常清楚，是這樣說的——“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從語言文字和習俗來看，也都是不一樣的，種族也是不同的，但是，世界在變化，比如中國的情況，前世達賴喇嘛從流亡地返回西藏的時候，中國的皇帝已不復存在了，中國革命剛剛開始，當時，前世達賴喇嘛說，中國如同斷了源頭的江河，但是，現在看來，並不是斷了源頭的江河。

如今，有些人說前世達賴喇嘛做了很多，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有點沒能力，我們必須要現實深入地思考，雖然我們有西藏獨立的權利，但是現在西藏境內的形勢非常嚴峻。我接見華人朋友時常說，印度的東南西北，都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但是因為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力和法治，以及民主自由等，所以沒有分裂的危險。同樣，藏人也有不同的語言文字等，如果真的能把藏人看成你們所說的“兄弟民族”，去尊重和友愛，公平對待的話，我們藏人也會考慮的。我們流亡者中，有的從西藏過來幾個月後，就去了美國、歐洲，他們並不是為了學習宗教，是為了錢。所以，我們藏人也需要錢和物質。我們爭取西藏獨立，是很難實現的。另外，獲得獨立，過著貧窮的生活，還不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使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很好地繼承和發展我們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化。

據說當今的中國，信仰佛教的人達四到五億。現在，達蘭薩拉平均每週都有10到20的漢人來自中國大陸，他們見到我時，有的流著眼淚說：“請不要忘了中國的佛教徒”。同樣，一些重要的法會上，因為有漢語翻譯，像

去年在菩提伽耶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上，就從中國大陸來了有數千華人信徒。過去，西藏的宗教文化，吸引了中國的很多皇帝，乃之成為佛教徒。未來，也會有很多中國人關注佛教，特別將有很多漢人喜愛藏傳佛教。

經濟方面，中國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我們應得益於此，在我們的宗教和文化方面，如果藏人自己能夠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也可以幫助中國的數億佛教徒，這樣，不僅對佛教有利，也對個人有利，是雙利。這樣的情況下，你們必須知道，“「中間道路」”，在本質上取得了成果。

現在，有人說，與中國政府的接觸沒有取得任何成果，這是一面之詞。從民眾的層面來說，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我們以“「中間道路」”為原則，中國政府方面能夠開放一點點的話，就很容易交流，而說獨立的話，就等於自己關上了門。對這些問題，你們要慎重考慮，在這裡的噶倫堡、大吉嶺、甘托克三地的藏人，你們都有責任。

雖然我已經完全退休了，但是，我是一個藏人，其中的安多哇（笑），之前，沒有隸屬於甘丹頗章政權（笑），但是，最主要是境內、外廣大人民信任我，所以我有責任。因此，今天向聚集在這裡的人民，介紹一下西藏的基本狀況，請你們記住這些。

總之，會發生變化，六十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三四十年前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如今的中國內地，已有適當的言論自由，藏人到了中國內地後，感到有了不少的自由，但是，回到藏區，特別是拉薩，就有非常嚴厲的管制，這是有人說的。所以，中國在變化。西藏的情況，如今是漢人感到羞恥，藏人感到痛苦，對雙方來說，都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理性思考，對雙方都有利。所以，我們在走互利的「中間道路」，我相信在未來，會取得成果的，對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知道了嗎？你們要記住這點，扎西德勒！

**翻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組（已由達賴喇嘛辦公室審閱）**

~~~~~

**請登錄藏人行政中央新推出的「中間道路」網站；[www.mwa.tibet.net/cn](http://www.mwa.tibet.net/cn) 或 [www.middle-wayapproach.org](http://www.middle-wayapproach.org) 了解更多有關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等詳細信息**

# 「中間道路」：藏人行政中央的核心政策

文/藏人行政中央

## 「中間道路」-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

要妥善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就必須真正地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各項自治權利，全體西藏人民必須置於同一個自治機關的管轄範圍內的規定。同時，實現以上訴求的途徑只能是和平與非暴力方式。這是『中間道路』政策毫不動搖的核心原則。

## 「中間道路」的背景和歷史

『中間道路』(藏語發音:“Umaylam”)是達賴喇嘛尊者在1974年提出來的，即在中國憲法的框架內，實現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爭取以和平的方式和與中國政府對話，實現保護西藏民族之特性和獨一無二的文化。在過去幾十年裡，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多次討論了這一政策，是以民主的方式，逐次完善的。這是一個藏中兩族人民雙贏的提案，既不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又堅定反對中國政府現行的西藏人民的鎮壓和殖民政策。

時至今日，達賴喇嘛尊者仍毫不動搖地支持這個現實和務實的政策，以解決西藏所面臨的嚴峻且急迫的問題。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說了：“除了西藏獨立，其他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當時，正是『中間道路』奠定了在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的直接對話基礎。從1979年至1985年，達蘭薩拉方面先後派出四個代表團赴西藏進行實地調查，並在1982年和1984年於北京會見了中國的最高領導層，這種官方間的接觸持續到1993年8月。

從1987年起，達賴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一系列重要場合中闡述了『中間道路』政策，包括在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希望繼續敦促中國領導層展開對話。自2002年雙方恢復對話以來，一共進行了九輪會談。第七輪會談在2008年舉行，這一年西藏各地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抗議，中方代表要求西藏方面以書面的形式表述出所尋求的自治的性質。於是在2008年第八輪會談期間，西藏方面提交了《關於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

中國政府對《自治的建議》表達了一些疑慮和異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2010年1月9日，在最後一輪會談中，西藏代表就《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進行了闡釋。該闡釋詳細介紹瞭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實現全體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三個堅持註釋”<sup>1</sup>和中國政府的等級和權威；解釋了中國政府擔憂的幾個方面：單一的行政管理機構；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公共安全、監管人口遷移、語言和宗教。該闡釋還承諾：為了緩和中國政府對自治意見內“達賴

喇嘛尊者的立場和目的”的疑慮，達賴喇嘛尊者將發表正式聲明進行回應。

西藏領導人始終堅堅持通過『中間道路』來實現西藏人民名副其實的自治，並希望通過達賴喇嘛的特使和中方代表之間的對話找到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

**1註釋：**中央政府規定的“三個堅持”分別是：(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3)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關於中間道路更詳細的歷史沿革請參考單獨的時間表

西藏人民通過「中間道路」尋求的是什麼？

將滿足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但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和穩定。在自治區域內，西藏人民能夠共享自己的傳統習俗和相同的價值體系、語言、生活方式和地理環境。如今藏人所居住的區域分為西藏自治區(Tibet Autonomous Region)和鄰近以漢人為主的省份：如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的某些區域，與現有的治理結構相比，由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來管理以上所有藏人聚居的區域將更有效率與效力。

中國當局稱，西藏領導人意圖從西藏地區驅逐所有的漢人。事實並非如此，在《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並非主張驅逐所有非藏人。我們的擔憂是，以漢人為主，包括一些其他民族，大規模遷移到西藏地區，將會把藏人邊緣化。《自治的建議》要求保護和促進西藏地區以藏人為主的獨特性。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控制下的西藏全區，西藏人口約為620萬，大約佔中國總人口的0.47%。

西藏地區的行政管理，應該圍繞著保護和促進藏人的以下十一步基本需求：

語言、文化、宗教、教育、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的利用、經濟發展和貿易、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監督人口遷移，以及國際間的文化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交流。這符合民族區域自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

## 達賴喇嘛尊者的角色

2011年，達賴喇嘛尊者將政治責任移交了民選的西藏政治領袖（司政）及其帶領的藏人行政中央。

正如《自治的建議》指出，達賴喇嘛尊者已多次明確表

示，將不再擔任任何政治職務。然而作為西藏團結和身份的代表，達賴喇嘛尊者是藏人希望的燈塔。西藏人民將希望寄託於達賴喇嘛尊者，認為作為最受人民信任的人，尊者能把西藏民族帶入一個和平的未來。

身為一名藏人，達賴喇嘛尊者仍然致力於提供任何需要的支持，以早日解決目前的僵局，並始終是『中間道路』堅定不移的倡導者。

### 「中間道路」所獲得的廣泛支持

『中間道路』的解決方案，使許多國家政府，更加關注西藏問題，認清其嚴重性和緊迫性，並敦促中國與西藏方面直接對話。作為現今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具可行性的方案，『中間道路』得到了國際上許多國家的支持，比如美國、印度、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僅在過去的兩年裡，美國、歐盟（法國，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亞、巴西和盧森堡等其他國家的議會都通過了多項決議和聲明支持『中間道路』。

『中間道路』獲得了越來越多來自華人社群的支持。一些受人尊敬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也贊同該政策。包括劉曉波，一位仍被關押的諾貝爾獎得主，他在2008年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達賴喇嘛尊者的和平倡議。自那時起，中國學者和作家已經發表了千餘篇文章和評論，支持通過對話解決西藏問題。其中包括在北京的合法非政府組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描述了西藏人民的不滿並要求重新審視現行西藏政策。

在2012年，來自15個國家的82個華人非政府組織分別向聯合國、歐盟，以及各國議會和政府請願，督勸他們“敦促中國政府盡快開始談判。”支持『中間道路』的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著名作家王力雄、四川文學期刊的冉雲飛等等。

為了落實『中間道路』而呼籲雙方對話的全球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威·皮雷、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歐盟委員會副總裁夫人凱瑟琳·阿什頓、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前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珀、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和台灣總統馬英九。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2011年7月16日和2014年2月21日分別兩次會晤達賴喇嘛尊者期間，白宮對達賴喇嘛尊者堅持非暴力尋求與中國對話的承諾以及所追求的『中間道路』表示支持，白宮鼓勵雙方通過直接對話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白宮認為開展富有成果的對話將對中國和西藏產生積極影響。

『中間道路』已經獲得許多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支持，如南非大主教圖圖，美國的伊利·威修和朱迪·威廉姆斯、利比里亞的雷瑪·博維和波蘭的瓦文薩，伊朗的希林·伊巴迪，危地馬拉的李格波特·門楚·鄧，東帝汶的奧爾塔，阿根廷的阿道夫·佩雷斯·伊斯奎沃，愛爾蘭的梅利·科黎根·馬奎爾以及英國的貝蒂·威廉姆斯。

2012年，在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們寫道：西藏人民的聲音希望被聽到。他們一直在尋求名副其實的自治，他們選擇了對話和友好相助來實現他們的希望。中國政府應該聽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不滿並找到一個非暴力的解決方案。我們的朋友和兄弟達賴喇嘛尊者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從未尋求離開中國的框架，一直堅持和平的道路。我們強烈敦促中國政府抓住他所提供的機遇，開展有意義的對話。一旦開始對話，這個交流渠道應該保持開放、積極並富有成效。它將在尊重西藏人民的尊嚴和中國的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解決造成當前緊張局面的核心問題。

在西藏支持『中間道路』的傑出領導人包括已故的班禪喇嘛，西藏前噶倫，已故的阿沛·阿旺晉美也曾敦促中國政府在西藏實現《十七條協定》里關於區域自治的承諾。(1)

已故的中國共產黨的一位西藏高級官員平措汪杰指出：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只尋求名副其實的自治”的『中間道路』，在現代歷史條件下，表現了對西藏及西藏全體民族的根本利益及其前途命運的慎重思考，以及知己知彼，對時局作出切實慎重考慮後認真負責的態度，是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的想法。

支持把所有藏人統一在一個自治體系下進行管理的藏族領導人包括多傑才旦——中共高級官員及北京藏學研究中心主任，桑傑益希(天寶)——資深的藏族中共官員，拉薩西藏大學的英語教授扎西次仁，以及支持在同一行政管理下統一全藏人的西藏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楊嶺多吉。

**（1）註釋：**西藏政府在1951年在軍事入侵的威脅下被迫簽署該協議。1959年，中國未能遵守承諾而使此協議作廢。

### 未來的前進之路

藏人行政中央正在尋求華人社群乃至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支持，以鼓勵中國政府本著和解精神恢復對話，珍視這一使雙方都能充分獲益的真正的自治政策。西藏領導層認為，中國政府再也無法辯稱藏人對當前中國的政策感到滿意。因此西藏人民必須獲得處理自己事務的真正發言權，才能獲得和諧的生活。通過『中間道路』，中

華人民共和國可以通過合法的統治地位確保西藏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國際上，還能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提升其正面形象。

## 『中間道路』發展年表

### 文/藏人行政中央

(歷年有關『中間道路』的關鍵事件)

1949 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逐漸控制西藏。

1951-1959 1951年，中國政府迫使西藏代表簽署《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隨後中國政府違備其規定，使“協議”作廢。

1959 1950年至1959年代末，西藏各地掀起抗暴，包括1959年3月在西藏首都拉薩爆發的大規模抗暴起義。中國軍隊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並佔領整個西藏。在短短的七個月內，導致了87000名藏人死亡。為了逃離戰火，大約80,000名藏人追隨達賴喇嘛尊者翻越喜馬拉雅山脈流亡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等國。

1959 - 1974 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一個流亡藏人定居點。尊者最初居住在穆索里，後移居達蘭薩拉，並在此成立了藏人行政中央。接下來的歲月，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支持和指導下，專注於在世界各地建立藏人社區。聯合國大會分別於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就西藏問題制定了三個決議。

1974 流亡15年後，考慮到情況的嚴重性和境內藏人的痛苦，達賴喇嘛尊者提出了雙贏的解決西藏問題的設想，並與噶廈(藏人行政中央內閣)、流亡議會的領導人，以及西藏人民信任的朋友展開了系列的討論，成形了一個尋求自治的規劃：『中間道路』(藏語發音“Umaylam”)，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

1979 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指出，除了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討論，直言了與達賴喇嘛尊者交流的願望。因為已經有了『中間道路』的規劃，達蘭薩拉方面很快作出了積極的響應。從此，在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開始了長時間的接觸和討論。

1979-1985年 1979年8月、1980年5月、1980年6月和1985年6月，中國接受了流亡政府派出的四個代表團，前往西藏調查。代表團受到了當地藏人的熱烈歡迎，訪問了西藏各地，包括衛藏的拉薩、日喀則、薩迦、江孜、澤當、隆子、錯那、瓊閣傑、桑拿曲林、羊卓雍措

和浪卡子，還有安多地區的拉卜讓(今甘南)、西寧、果洛、熱貢(今黃南)、阿壩、左格(今若爾蓋)，以及康區的昌都、德格、甘孜、娘戎(今新龍)、結塘(現名香格里拉)，以及嘉戎地區的瑪康(今馬爾康)，羌塘地區的那曲，工布地區的工布江達、林芝。

1987 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發表演說，提出了《西藏五點和平計劃》，敦促中國政府按照『中間道路』展開認真會談。

1987 - 1989 同時(1987年)，拉薩爆發了大規模和平抗議，隨後遭到了中國軍隊殘暴鎮壓，並開始了新一波的抓捕。隨著和平起義的不斷出現，1989年3月中國宣布拉薩戒嚴。

1988 在西藏境內抗議不斷的時分，達賴喇嘛尊者在歐洲議會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建議》，詳述了《五點和平計劃》。該年9月，中國政府宣布願意與藏人談判，宣稱達賴喇嘛尊者可以選擇談判的日期和地點。達蘭薩拉表示歡迎，並公佈了六人談判小組名單。但是，會談開始之前，中國政府恢復原有的強硬立場，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

1989 因為達賴喇嘛尊者在寬容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提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1992 達賴喇嘛尊者宣布由於缺乏中國政府的積極回應，《斯特拉斯堡建議》自動失效。

1993 由於北京未能對達賴喇嘛尊者的眾多外交倡議給予回應，延續了14年的與中國政府的正式接觸終止了。第二年，即1994年，北京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對西藏採取了強硬政策，標誌著北京已經由較開放轉化為更封閉和僵化。

1994 由於北京改變了立場，達賴喇嘛尊者提出藏人社區就未來應如何重新定位西藏的自由鬥爭，以及對中國應採取何種立場舉行全民公決。

1997 1997年9月，初步民調顯示，身為西藏人民的精神和政治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得到了全體西藏人民的深深信任。西藏人民議會一致通過決議，就未來藏中關係，達賴喇嘛尊者將是西藏方面的唯一決策者。西藏人民議會還進一步決定，達賴喇嘛尊者做出的任何決定，都等同於通過全民公決做出的決定。

1998 1998年3月在西藏3.10抗暴29週年紀念會上，達賴喇嘛尊者在公開講話中，就西藏人民對他的信任和期望，表達了謝意，並重申繼續遵循『中間道路』。

2001 達賴喇嘛尊者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

敦促重啟藏中對話。

2002 以『中間道路』為基礎，藏中雙方一共進行了九輪會談。2002年9月，雙方代表在北京舉行了第一輪會談；2003年5—6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二輪會談；2004年9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三輪會談；2005年6—7月，在瑞士柏林舉行了第四輪會談；2006年2月在中國桂林舉行了第五輪會談；2007年6—7月在上海和南京舉行了第六輪會談；2008年5月在深圳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議；2008年6—7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七輪會談；2008年10—11月在北京舉行了第八輪會談；2010年1—2月在湖南和北京舉行了第九輪會談。

2008 2008年上半年，爆發了前所未有的遍及西藏各地的抗暴。2008年7月，在與中國舉行的第七輪會談中，中國代表提出要西藏方面書面描述自治的性質。於是，在當年十月到十一月召開的第八輪會談期間，西藏方面提交了《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建議》闡述了西藏民族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內的運作，定義了“西藏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行政管理之下”、“自治的實質和架構”以及“藏人的十一項基本訴求”等方面的內容。中國拒絕了這一提議，謊稱《建議》含有“大西藏”“高度自治”“半獨立”和“變相獨立”之內容。這一切都被告定性為違反了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

2009 藏區開始自焚來抗議中國政府繼續佔領西藏，實施政治壓迫、宗教迫害、文化同化、經濟邊緣和環境破壞等殘暴政策。自焚者強烈呼籲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和西藏自由！

2010 為防止中國政府的誤解和歪解，第九輪會談期間，西藏代表就《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進行了闡釋。該闡釋詳細介紹瞭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實現全體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三個堅持”<sup>1</sup>和中國政府的等級和權威；解釋了中國政府擔憂的幾個方面：單一的管理機構；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公共安全、監管人口遷移、語言和宗教。然而，被中國政府再次拒絕。

2011 2011年7月，奧巴馬總統會見達賴喇嘛尊者，讚揚了尊者的非暴力主張和致力於通過與中國對話解決西藏問題，完全認同尊者的『中間道路』，並鼓勵有關各方參與“直接對話，以解決長期存在的分歧”。白宮稱：“富有成果的對話將有利於中國和西藏人民。”司政洛桑森格博士領導的西藏內閣也重申了對『中間道路』的堅定承繼，明確了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與中國代表之間展開對話，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為實際的開端。今天，到目前（2014年4月）為止，西藏境內至少發生了130起自焚抗議悲劇。然而，藏中對話仍然停滯不前。

同時，世界上眾多的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歐盟、法國、日本、澳大利亞、巴西、新西蘭等，一致鼓勵並認為通過對話解決西藏問題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儘管西藏境內形勢不斷惡化，自焚人數持續上升，西藏人民對『中間道路』的承諾始終沒有動搖。因為這一理念已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日益增長的支持和鼓舞，其中也包括許多真正追尋和平與正義的中國人。

**注：**1中國政府規定的“三個堅持”分別是：(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3)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 關於『中間道路』的常見問題

文/藏人行政中央

### 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

#### 1. 什麼是『中間道路』？

『中間道路』(藏語發音為“Umaylam”)是達賴喇嘛尊者在1974年為了實現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構想的一個政策，目的是通過與中國政府對話找到一個保護西藏民族獨特文化和身份的和平方式。這個政策在過去幾十年裡經過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的多次討論，以民主的方式逐步完善。這是一個在維持現狀與尋求獨立之間尋求折衷的雙贏提案，既不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又堅定反對中國政府現行的西藏人民的鎮壓和殖民政策。

這是一個能保障有關各方切身利益的務實立場：對藏人而言，他們的身份和尊嚴得以保護；同時對於中國，這個意味著自身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得以保持。它使得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國政府的直接接觸在1979年成為了可能，四批西藏流亡領導人代表團在西藏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並在1982年和1984年舉行了試探性的會談。從2002年到2010年，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國領導人的代表之間開展了九輪正式會談及一次非正式接觸。

#### 2. 為何尋求自治？

西藏領導人相信名副其實的自治是一個務實的方案，是可以實現西藏和中國雙贏的解決方案。在今天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國家不能靠閉關自守存在。如今許多國家放棄一些自己的主權並加入共同體，例如歐盟。

#### 3. 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將採取什麼形式？

西藏人民正在尋求這樣一種自治形式：它將滿足他們的

基本需求,同時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和穩定。他們尋求在自治區內西藏人民可共享藏族的傳統習俗和相同的價值體系、語言、生活方式和地理環境。如今藏人所居住的區域分為西藏自治區(Tibet Autonomous Region)和鄰近以漢人為主的省份:如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的某些區域,與現有的治理結構相比,由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來管理以上所有藏人聚居的區域將更有效率與效力。

中國當局稱,西藏領導人意圖從西藏地區驅逐所有的漢人。事實上,《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已明確指出,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並非主張驅逐所有非藏人。

我們的擔憂是:以漢人為主,包括一些其他民族,大規模遷移到藏地,將會把藏人邊緣化。《自治的建議》要求保護和促進西藏地區以藏人為主的獨特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西藏人口估計為620萬(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大約佔中國總人口的0.47%。

一個西藏地區政府將管理保護和促進藏人的十一種基本需求,具體如下:

語言、文化、宗教、教育、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的利用、經濟發展和貿易、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監管人口遷移和文化、教育和宗教與其他國家的交流。

這符合民族區域自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

#### 4. 『中間道路』是否得到了西藏人民的廣泛支持?如果是這樣,西藏人民如何表示支持的呢?

是的。『中間道路』是通過在1988年和2010年之間舉行的一系列的會議和民意調查之後才成為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政策。它不僅由民主程序由西藏流亡議會和噶廈進行討論協商而決定,還直接徵求了代表西藏人民的公眾代表的意見。在199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64%的被調查者表示,沒有必要舉行公投,這些受訪者同時支持達賴喇嘛尊者提出的任何政策。按照民意調查的結果,1997年9月18日西藏流亡議會一致通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決議。同樣在2008年11月召開了六天的全體藏人特別大會中,80%以上的與會者重申支持『中間道路』。最後,在2010年3月,西藏流亡議會一致通過了這個決議,因此『中間道路』獲得了絕大多數藏人的支持。

#### 5. 來自藏區藏人的聲音是怎麼支持『中間道路』的呢?

雖然不能公開收集藏區人民的意見,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採用了任何可能的方法將他們的意見考慮到

決策過程中。例如,在1988年6月從西藏剛剛到來的藏人被邀請參加一個特殊的政治會議。同樣,針對1995-96年的公投西藏內部的意見通過一項民意調查被收集起來。第一次全體藏人特別大會在2008年11月召開期間,在藏區藏人的書面及口頭建議被徵集。大多數觀點支持『中間道路』。

此外,『中間道路』受到在西藏的高級領導人和藏地知識分子的支持,包括已故班禪喇嘛,他公開表示支持『中間道路』,以及高級領導人如已故的阿沛阿旺晉美,巴瓦平措汪杰,多傑才旦,桑傑益希(天寶),扎西次仁,楊嶺多吉等。

#### 6. 『中間道路』僅主張文化自治嗎?

不。『中間道路』提倡自主管理。它不僅限於文化自治。《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意見書》在“藏人的基本需求”一章闡述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範圍內統一在一個自治機構下實現以下十一種自治權。

藏人的基本需求包括:

- 1) 語文
- 2) 文化
- 3) 宗教
- 4) 教育
- 5) 環境保護
- 6) 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
- 7) 經濟貿易和發展
- 8) 公共衛生
- 9) 公共安全
- 10) 管理外來移民的製度
- 11) 與其它國家在文化、教育、科學、宗教等領域的交流

#### 7. 當藏人實現了名副其實的自治,生活在今天的西藏自治區和鄰近的藏人聚居區非藏族人口的未來將會怎樣?

《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意見》已明確指出:“我們的意圖不是驅逐在藏區長期居住的非藏人。”藏人的擔憂是:以漢人為主,包括一些其他民族,大規模遷移到西藏地區,將把藏人邊緣化並威脅到西藏脆弱的生態環境。規範流動人口的建議符合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第四十三條規定:“依照法律規定,民族自治的自治機關應當制定措施控制流動人口”。

#### 8. 實現了名副其實的自治將有利於西藏的環境保護嗎?

是的。西藏具有脆弱的生態系統,是亞洲諸多最大的河流的主要源頭。今天,西藏的傳統環境正在遭受不可挽

回的損害。“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的利用率”是《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意見》所提出的第五和第六項基本需求。語言文化被加速同化、環境受到破壞、自然資源被過度開採是藏人行政中央加強推行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關鍵原因。年復一年，證據不斷顯示，中國的環境和發展政策的不可持續並造成長期的環境破壞。這包括被築壩的水系，其支流延伸到印度、巴基斯坦、緬甸、越南、柬埔寨，老撾和中國大陸，從而影響了幾乎世界人口的一半。

### 9. 為什麼藏人行政中央追求『中間道路』？到目前為止有何成果？

『中間道路』政策已經在許多方面取得成果，包括允許與境內藏人接觸並與中國領導人多次會談。著眼於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政策持續獲得壓倒性的支持，這些支持不僅來自國際社會，而且來自中國人民。

『中間道路』政策使西藏領導人和中國政府從1979年開始直接接觸，從而使得四批流亡藏人調查代表團可以赴西藏考察。調查代表團訪問了在衛藏的拉薩、日喀則、山南、工布、薩嘉、林芝、隆子、錯那、澤當、江孜、曲閣嘉、桑拿曲林、羊湖和浪卡子，安多的甘南、西寧、果洛、黃南、阿壩、若爾蓋以及康區的那曲、昌都、德格、甘孜、新隆、香格里拉（原稱中甸）、馬爾康。在1982年和1984年，中國領導人與來自達蘭薩拉的考察代表團在北京舉行會談。從2002年到2010年，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國領導人的代表之間開展了九輪正式會談及一次非正式會議。到目前為止，成千上萬的學生、僧侶和僧尼能夠在流亡社會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有助於傳承西藏的文化和宗教。

『中間道路』使許多政府支持這個面向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幫助它們在與中國的對話時對西藏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提出關注。作為解決現今西藏問題的最具可行性的方案，『中間道路』擁有很強的國際支持。許多國家的政府已正式表示支持『中間道路』，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印度、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僅在過去的兩年裡，美國、歐盟（法國，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亞、巴西和盧森堡及其它國家的議會通過了多項決議、動議和聲明以支持『中間道路』。

『中間道路』獲得了越來越多來自華人社群的支持。一些最受人尊敬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也贊同該政策。他們包括劉曉波，一位仍被關押的諾貝爾獎得主，他2008年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達賴喇嘛尊者的和平倡議。自那時起，中國學者和作家已經發表了超過1000篇文章和評論支持通過對話解決西藏問題。其中包括在北京的合法非政府組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描述了西藏人民的不滿並要求重新審視

現行西藏政策。

在2012年，來自15個國家的82個華人非政府組織分別向聯合國、歐盟及各國議會和政府請願，勸說他們“敦促中國政府盡快開始談判。”支持『中間道路』的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著名作家王力雄、前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學者和憲政學家張博樹、四川文學期刊的冉雲飛、居住於北京的資深共產黨員和法學家於浩成、前中國社會科院經濟學家蘇紹智、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親密助手嚴家琪。

為了落實『中間道路』而呼籲雙方對話的全球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威·皮雷、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歐盟委員會副總裁夫人凱瑟琳·阿什頓、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前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珀、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和台灣總統馬英九。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2011年7月16日和2014年2月21日分別兩次會晤達賴喇嘛尊者期間，白宮對達賴喇嘛尊者堅持非暴力尋求與中國對話的承諾以及他追求的『中間道路』表示讚賞，白宮鼓勵雙方通過直接對話來解決長期存在的差異，白宮認為開展富有成果的對話將對中國和西藏產生積極影響。

『中間道路』已經獲得許多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支持，如南非大主教圖圖，美國的伊利·威修和朱迪·威廉姆斯、利比里亞的雷瑪·博維和波蘭的瓦文薩，伊朗的希林·伊巴迪，危地馬拉的李格波特·門楚·鄧，東帝汶的奧爾塔，阿根廷的阿道夫·佩雷斯·伊斯奎沃，愛爾蘭的梅利·科黎根·馬奎爾以及英國的貝蒂·威廉姆斯。

在2012年，在一封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們寫道：西藏人民的聲音希望被聽到。他們一直在尋求名副其實的自治，他們選擇了對話和友好相助來實現他們的希望。中國政府應該聽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不滿並找到一個非暴力的解決方案。我們的朋友和兄弟達賴喇嘛尊者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從未尋求分離，一直堅持和平的道路。我們強烈敦促中國政府抓住他所提供的機遇，開展有意義的對話。一旦開始對話，這個交流渠道應該保持開放、積極並富有成效。它將在尊重西藏人民的尊嚴和中國的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解決造成當前緊張局面的核心問題。

### 10. 藏人是否尋求中國政府宣稱的“大藏區”和“高度自治”？

藏人行政中央致力於倡導『中間道路』。這個政策既不尋求“大藏區”，也不是“高度自治”，而是藏人在一

個統一的行政管理下實行名副其實的自治。這個與民族區域自治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相關規定相一致。

中國特意臆造了“大西藏”從而使國際社會誤認為藏人尋求分離或為西藏地區劃界線。藏人行政中央從未使用“大藏區”這個術語。涵蓋了整個西藏高原的三大傳統省份衛藏，康巴和安多一直都是西藏的重要部分。它們不僅有相似的地理地形，它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也相同。把西藏劃分到中國的多個省份明顯違反中國的法律以及憲法第四條關於少數民族在“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的規定。99%的維吾爾人居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95%的壯族居住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而屬於同一個群體的藏人卻被分佈在不同省份的自治縣和自治州，導致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人口不足50%。

西藏佔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這不是政治創造，而是因為藏人千百年來棲息在西藏高原。西藏四分之一的佔地面積不應成為中國政府的擔憂，因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佔中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而內蒙古自治區佔八分之一。此外，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並沒有特定的地域限制，而是從行政管理上在所有地區實施中國法律從而讓藏人當家作主。

讓擁有相同傳統，經濟和地理環境的藏人處於同一個行政單位將是一個有效的治理方式，而不是將他們劃分到西藏自治區和其它中國四個省份，即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

## 11，請問『中間道路』是否違背中國憲法？

不。『中間道路』尋求西藏人民在同一個行政管理下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這完全符合中國憲法第四條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條關於“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規定。自治法將區域自治描述為“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並在序言裡闡釋道“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國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精神，體現了國家堅持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原則。”

~~~~~  
請登錄藏人行政中央新推出的「中間道路」網站；[www.tibet.net/cn](http://www.tibet.net/cn) 或 [www.middlewayapproach.org](http://www.middlewayapproach.org) 了解更多有關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等詳細信息

## 為什麼中間道路？為什麼非暴力？

文/胡平

今年4月14日，正在瑞士訪問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接見居住在瑞士的藏人時，向藏人再次講述了中間道路和非暴力原則。

達賴喇嘛說，要解決西藏問題，遲早要和中國政府對話，除此沒有其他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提西藏獨立，是無法對話的，只能走向對抗，這樣不好，沒有希望。如果西藏能獲得名符其實的自治，對中國政府有利，對藏人也有利。

在我看來，中間道路具有兩大優點：第一，它在道義上是正確的，因為中間道路保障了藏人的基本權益，而且是互利的，對藏人和對中國都有利。第二，中間道路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是務實的。

這第二點也很重要。一方面，只考慮現實而放棄理想，屈服於眼下的現實而放棄基本權益的爭取，無疑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只是高調地談理想而不顧及現實，不考慮現實的可能性與操作層面上的可行性，也是不正確的。

前年（2011年）3月，我和蘇曉康觀訪達蘭薩拉，恰好《星島日報》北美版總編王寧先生也在達蘭薩拉觀訪。回到美國後，王寧先生在《星島日報》上發表了一組相關報導，其中有一篇是他對達賴喇嘛的專訪。

專訪中，達賴喇嘛對為何藏人無法用暴力達到自己目的做了實際分析。

他說，有次他會見一個激進藏人，對他說，現在我們假設決定用武力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那我們首先要有槍，還要有彈藥，幾支槍是不夠的，要幾千支，但誰會賣給我們呢？印度？美國？好像沒有人會賣軍火給我們；那時候從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那也許會買到前蘇聯的軍火。槍的來源有了，但錢從哪裡來呢？上述那些國家不會給的。就算有了錢也買好了槍，但如何運進中國呢？通過哪個國家邊境運進去呢？沒有國家會同意的。過去CIA幫我們空投過，但那是過去了，現在決不會了。所以說，用武力是無法解決我們問題的。

達賴喇嘛還指出，有不少歐美人士明白無誤地對他說過，如果藏人用暴力來解決問題，他們就不會再支持藏人了。

達賴喇嘛在專訪中談到，海外藏人中有些人，身不在其位時，往往對執政當局批評得很厲害，但讓他們自己去

做那些工作時，他們才發現事情不像他們置身在外時那麼簡單。

前年3月，我和蘇曉康觀訪達蘭薩拉，和即將卸任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會談，也談到中間道路的問題。我們問，隨著達賴喇嘛的退休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改選，藏人會不會改變中間道路呢？

桑東仁波切明確回答：不會。桑東仁波切說，大多數藏人是支持中間道路的，這次三位競選首席部長的候選人都主張中間道路，因此，不論誰當選，都會繼續中間道路。

我提出，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務實的，可行的；如果改成要求獨立，那很可能會導致藏人在國際上活動空間的萎縮。現在，達賴喇嘛訪問美國，和美國總統見面，訪問德國，和德國總理見面。中共當局抗議，指責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西方政府首腦理直氣壯地反駁，說達賴喇嘛不是分裂分子，達賴喇嘛是主張真正自治；他們還可以反過來呼籲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對話，認真落實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藏人放棄中間道路了，改成主張獨立了，而西方各國政府都是承認北京政府的，都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那麼他們還方便和達賴喇嘛會見嗎？

桑東仁波切表示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說流亡藏人對中間道路有深入的討論和共識。

也許有人會說，中間道路和非暴力確實很好，但問題是行得通嗎？面對冥頑不靈的中共當局，中間道路有實現的可能嗎？

對於這樣的問題，達賴喇嘛早就講過，他不是寄希望於中共當局，而是寄希望於中國人民。在今年3月29日於西孟加拉邦弘法時，達賴喇嘛再次重申了他的這一觀點。

達賴喇嘛說：儘管到目前為止，對於中間道路，中國政府方面還沒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應，但是，政府和人民哪個重要？當然人民更重要。雖然在專制政權下政府很有權威，但從長遠看，還是人民更重要。

達賴喇嘛告訴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在2008年之後，我見了很多華人，其中有知識分子和學生數千人。他們之中，有的是在美國和歐洲留學的人，還有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組織了一些專門的會議，在向他們介紹中間道路的時候，都非常歡迎。總之，支持中間道路的華人力量很大。

達賴喇嘛說，當今中國有著巨大的變化，國內敢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多，漢人間支持“中間道路”的人也越來也

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這一互利雙贏的解決西藏問題方案終將取得成果。

我想，達賴喇嘛對中間道路和非暴力的闡述，不僅對藏人的事業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們漢人爭取自由民主也深有啟發。

## 怎樣理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文/丁一夫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達賴喇嘛在印度東北部的西孟加拉國邦薩路噶弘法的時候，對三萬多信眾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這次講話寓意頗深，可圈可點。

### 藏民族的團結，非常重要

達賴喇嘛談到了兩年前他所宣布的政治退休決定，這一決定結束了西藏傳統的政教結合的政治體制，在藏民族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一步。達賴喇嘛對藏人說，「作出這樣的決定，並非失去信心，並非西藏問題沒有希望」，而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改革。現在政治權力是由民選的領導人來承擔。

但是，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使得藏人必鬚面對一個新的挑戰，那就是怎樣維持政治上的團結。半個世紀的流亡證明，藏民族之所以在政治上沒有被擊潰，西藏問題之所以仍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時時敲響警鐘，一個重要原因是藏人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因為他們有一個精神領袖在政治上領導他們。達賴喇嘛政治退休已經兩年，以後流亡藏人在民主化的體制下，在個人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地方生活，是否能夠繼續保持政治團結，事關重大。

有可能影響政治團結的一個因素是歷史上的地域差異。歷史上，西藏三區各有方言，也存在政治上的差異。到清末和民國時期，西藏三區在政治上不再是統一的政權。達賴喇嘛在講話中指出，以前拉薩的噶廈政府管轄範圍僅僅是衛藏和康區的金沙江兩岸，而現在，康區、安多和衛藏統一的意識，已經非常強大。這種統一的藏民族的民族意識，事實上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讓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給打出來的。是藏人的苦難和血淚鑄成了這種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未來西藏問題無論是什麼走向，都不會局限於西藏自治區，而必然包括周邊四省的藏區在內。所謂「大藏區」的觀念，不是什麼人想出來的，恰恰是共產黨用飛機大炮打出來的。統一的藏民族，已經

成為未來政治家的不二選擇。

然而，統一的藏民族的未來，是要爭取獨立，還是放棄獨立而訴求自治呢？

### 「中間道路」和藏人的政治共識

在藏民族統一的前提下，形成在「中間道路」議題上的政治共識，對藏人的政治團結非常重要。達賴喇嘛指出，西藏政治領袖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制定了互利的「中間道路」，七十年代末和中國政府有了直接聯繫。雖然後來和中國政府的接觸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但是在漢藏民眾層面的交流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越來越多的漢人，特別是漢人知識分子支持「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指出，雖然藏民族有追求獨立的權利，但是「中間道路」作為一個互利雙贏的方案，對藏民族是有利的，也更有機會得到成功。達賴喇嘛說：「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如作家、藝術家、教師等，很多，見我時，雖然大家的心裡都有獨立的意願，但是，當我們考慮到能否取得成果時，就感到雙贏的『中間道路』是有道理的，並且，可以很好的解釋給漢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支持。我見到的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說要走西藏獨立道路的，雖然我們有這個權利。」他還勸導藏人，由於力量懸殊，「我們爭取西藏獨立，是很難實現的。另外，獲得獨立，過著貧窮的生活，還不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里面，使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很好地繼承和發展我們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化。」

達賴喇嘛說，以「中間道路」為原則，得到統一的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而放棄獨立，藏人可以從中國的經濟強大中得益。所以，藏人應該團結起來爭取自治，「而說獨立的話，就等於自己關上了門。」而對中間道路，他說，「我們在走互利的中間道路，我相信在未來，會取得成果的，對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達賴喇嘛向藏民族民眾發出了呼籲，要他們在「中間道路」的原則下達成全民族的共識和團結，也向中國政府又一次發出了信息，藏人放棄獨立，爭取自治，「西藏的情況，如今是漢人感到羞恥，藏人感到痛苦，對雙方來說，都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理性思考，對雙方都有利。」

### 漢人對「中間道路」的支持

達賴喇嘛特別向聽眾指出，有越來越多的漢人知識分子轉而支持「中間道路」，認識到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漢藏民族一條互利雙贏的道路。

事實上，「中間道路」作為藏民族以非暴力原則爭取民族自由的道路，其成功離不開漢民族，特別是漢人知識

精英的認同和支持。達賴喇嘛以前說過很多次，漢藏民族在以往幾百年的時間裡是友好相處的，只是近代以來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漢人了解了藏人的真實遭遇和真實感受，人類與生俱來的人性和良知就會讓他們同情和支持藏民族的訴求。

事實上，漢人最終將支持藏民族的自決權，還有更深的的原因。當前中國人民所盼望的民主轉型和藏人在爭取的民族自決，既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對話，又有本質上的一致性。雖然威權政府也有可能達成「一國兩制」，區域或民族自治並不一定只能在民主體制下才能達成，民主政府也不一定保證在區域或民族自治方面做出足夠的讓步，但是，現在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停滯和藏人自決訴求的受挫，卻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即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僵硬保守。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說過：「只要漢人還處在無自由的獨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於漢人獲得自由；只要內地民眾無法獲得真正的民間自治，藏人和其它少數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根本上有賴於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的解決。不管西藏問題的未來解決採取何種模式，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都是必須的政治前提。」然而，更準確的敘述應該是，只要藏人還沒有獲得民族自決權之下的真正自治，中國人民就不會得到民主和自由。這就是中國人民最終將支持藏人的自治訴求的根本原因。

### 我為“中間道路”叫好

——參加日內瓦漢藏會議隨筆  
文/田牧（德國）

西藏問題我知之甚少，了解的也就是學生時代的那些教材知識而已。今年六月，達賴喇嘛尊者來歐洲幾國訪問。有西藏朋友，也有民運朋友都建議我去現場聽一聽達賴喇嘛尊者的演講。見過達賴喇嘛的朋友還特別強調：“老人家特別慈祥、可親，你會被他感染和融化的。”確實如朋友所言，我被感動了，事後還撰寫了《人間莫貴於真愛——聆聽達賴喇嘛演講的感想》一文，在《歐華導報》上發表。本次日內瓦漢藏會議，我抱著學習的態度去參加，頗有一些收穫。

### 超越歷史，不是放棄歷史

達賴喇嘛尊者在會議的致辭中一再強調，大意是：“不糾葛歷史，不談獨立，我們走‘中間道路’，不是領土之爭，而是保護藏民族的宗教、文化、自然環境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曹長青激動地說：達賴喇嘛和西藏同胞一退再退，他們已經沒處可退了。我們漢人要有點良心，有點人性，人家連國土都不爭了，卻連起碼的自治權利還得不到？在座的漢族朋友難道還不站出來做些道義之

事嗎？

說“西藏自古是中國的領土”，把唐朝的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和親”歷史也拿來作為原始依據，非要一竿子捅到1300年前，我都覺得牽強。歷史上歐洲各王國之間“和親”，或者“聯姻”的風俗盛行，無非只是表述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手段，或者政治聯盟，抑或是搭建友誼橋樑之類。難道因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拿破崙。波拿巴與奧地利公主瑪麗亞·劉易斯的聯姻，就能說法國是奧地利的屬國？難道說俄羅斯帝國亞歷山大三世。亞歷山德羅維奇與丹麥公主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和親，就能說俄羅斯是丹麥的屬國？

漢民族本身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動亂史、分裂割據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近3000年，其中有2600多年處在戰爭、分裂、割據、動亂的歷史時期，那段歷史歲月，大漢民族自顧都不暇，哪有餘力控制吐蕃？僅憑這點我自己都難以信服“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的歷史真實”。至於明清時期漢藏關係如何，完全可以從史冊記載上考察、查證。

陳破空在小組發言中將漢藏歷史發展作了一次梳理，聽來也令人信服。達賴喇嘛尊者提出超越歷史的建議，是出於漢藏的現實政治狀況，出於維護漢藏人民和平友誼的未來發展。但是作為漢藏民族的歷史記錄，作為人類史學的研究，還必須客觀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 中間道路，贏得時間和空間

日內瓦漢藏會議的爭執和辯論自始至終圍繞著“獨立”還是“中間道路”、“自決權”還是“自治權”展開。

提出西藏人民有“自決權”，可以“獨立”，無疑是正確的，毋庸置疑。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部分第一款就是：“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第三款是：“本公約締約各國，包括那些負責管理非自治領土和託管領土的國家，應在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條件下，促進自決權的實現，並尊重這種權利。”

但是本次漢藏會議的主題是尋找“共同點”，所以我們首先要尊重和相信達賴喇嘛尊者的智慧，要支持和信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抉擇，這是他們經過了50年的努力得出的結論。

仔細、冷靜地思考一下，我覺得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確實有其積極意義。從理想和原則退到漢藏的現實狀況。一是尋求漢藏人民的公約數和共同點。要使漢藏人民都認知和理解這些基本原則和歷史事實，需要一個長期解釋和宣傳的過程。漫長的50年過去了，與其無效

地空喊，不如尋求漢藏人民的基本共識，走“中間道路”。二是在國際政治大環境中贏得空間，贏得時間。現實狀況正像胡平指出的：一提“獨立”和“自決權”，“美國總統、德國總理還會和他會見嗎？達賴喇嘛還能如此頻繁地到西方國家有效地在國際講壇上發聲嗎？”“中間道路”至少贏得了國際大環境，並逐步贏得漢族人民的理解，贏得瞬息流逝的時間。

這個世界總是在種種矛盾交織中讓我們為難，它沒有平坦之途，前方的旅程總是曲折和顛簸，但人們還得朝前走啊！對付共產黨的獨裁制度，以及應對這個充溢著金錢臭味的世界，需要達賴喇嘛尊者的智慧。我不知道旁人如何思量和判斷，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尊重和相信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思維和決策。

### 漢藏關係，需要人民共同維護

對於漢藏關係的處理，以我個人的認識，高度“自治權”，有聯合國憲章為依據；履行“自決權”，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依據，怎麼都可以。依據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來說，人種、族群、區域、疆界的概念將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大同和人類共存。我生活在歐洲大陸20年了，頗有體會……

小小的瑞士國，有國而無自己的語言，不到700萬人口，卻以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拉丁羅曼語等為官方語言。鑲嵌在瑞士和奧地利北端的袖珍國列支敦士登，東西寬僅8公里，南北長20公里，也就相當於我所居住的德國小鎮所轄區域，而人口僅是我們小鎮的一半，2.7萬人，也使用德語。在歐洲生活，孩子的語言學習壓力通常較重，我女兒11歲，已經是德語、英語、法語三種語言平頭推進，再過一年，還得增加一門語言拉丁語，或者是西班牙語、意大利語。也該如是，不則好容易學習了幾年的語言，一踩油門，卻進入了鄰國境內，又變成了啞巴。

歐洲的邊界門戶洞開，這次會前陪盛雪、嚴明沿途旅遊，穿越了盧森堡、德國和瑞士幾國。記得2004年胡平來歐洲，我開車送他去德國的亞琛坐火車去巴黎，一路聊天，一不留意，卻已經跨越了荷蘭、比利時兩國邊境，進入了比利時。歐洲一些國家同樣有許多民族，譬如：瑞士生活著約70%的日耳曼人，列支敦士登也有約63%的日耳曼人，從沒見他們鬧著要回家。

所以，這些對於海外民運朋友來說，身臨其境，耳濡目染，已經滲入我們的骨髓、思想。儘管會議還有爭執和辯論，但與會的大多數朋友從大局著眼，認識到：假如“會議共識”只是寫給我們自己，或者寫給西藏流亡政府的，僅作為我們這些人在對待漢藏關係的內部約定，怎麼寫都有其道理，體現了與會者自己的觀點和

認知。但是“會議共識”公告天下，是寫給天下華人看的，去影響和帶動社會對漢藏關係的基本認識，就應該考慮到天下華裔的認知和情感，要爭取贏得漢藏人民的民心、民意和民情。北宋的蘇軾也說過：“天下之亂，出於下情之通塞。”所以明白人不光自己要明白，還得帶動和影響周邊的人明白，這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大會共識”在這樣的基礎上誕生。大會最終採納費良勇提出“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寫入共識”，並按照楊建利的意見，將“民族自決權”改為“民族自治權”。大會是在絕對多數的情況下通過了“大會共識”。

我是舉手贊成“大會共識”的，今後也會在漢藏關係上遵循此“大會共識”的內容行事。

### 海外民運，是否從達賴喇嘛智慧中得到啟迪

今年的六四網絡紀念大會上有位國內朋友提出一個期望，他的大意是：從事民主運動，要貼近和認知國內百姓的生活，不在於口號，不在於激情，要讓百姓了解政治制度改革的益處，其方針、策略要符合百姓的利益，與百姓的切身利益掛鉤，民運組織要努力成為老百姓的代言人。我覺得這些話是有道理的，民運朋友不能過於個性化、理想化，沉湎於“自娛自樂”之中。

打個比方：日內瓦會議結束，一撥人駕車去德國的慕尼黑，朋友們來自世界各國，路途不熟。而我來自德國，自然我駕車在前領路，朋友們駕車隨後。可一上高速公路，大道寬闊，我的感覺來了，一踩油門，嗖……竄出去，沒多久跑得無影無踪了。後面的車隊該如何想，如何說？“這傢伙，不知跑到哪去了？”失去了導航，朋友們只能慢慢磨蹭了。所以這已經不是“說”的問題，而是“挨罵”的問題了。這些年為什麼海外民運老挨罵呢？是否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達賴喇嘛尊者高瞻遠矚，從理想和原則退到漢藏的現實狀況，提出了“中間道路”的新思維，尋求漢藏人民的公約數和共同點。這些思維是否也能給我們海外民運帶來新的啟迪？海外民運陶醉於理想境界，總拿原則和理想作標尺，讓民眾難免有云裡霧裡的感觉。是否應該回到現實中，腳踏實地，從實際出發，提出新的思維和策略？

有德國某大學的華裔教授問我：“你相信達賴喇嘛的話嗎？”我直言相告：“我相信，因為他是宗教領袖，他不會褻瀆聖靈，不會違背佛教的教義。”很簡單的道理，梵蒂岡羅馬教宗本篤在世界各地演講佈道，我們也會這樣去懷疑和猜忌他嗎？

我敬仰達賴喇嘛尊者，我相信他的智慧，相信他的“中間道路”。

## 十七條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文/劉璐

達賴的中間道路是目前處理西藏問題的最溫和、最現實的方案。

西藏的人權問題向來少有人關注。日前中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2009年2月1日下發的《2009年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要點》指出：2009年中共將持續嚴打各種“滲透顛覆與分裂破壞”勢力，其中藏人的抗議活動儼然成為中共嚴打的重點。這份《工作要點》提出要對三類藏人實行管控：即：1、曾參與打砸搶燒活動被非罪處理人員；2、非法出境回流人員；3、寺廟清退人員。在公開的文件中宣布要對“非罪”的部分藏民實行“管控”，不僅反映了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也顯現了他們對藏人人權的粗暴踐踏。這讓我們對2009年的西藏人權狀況深深憂慮。

中國由於在近代歷史上屢遭列強欺凌，民族心理異常敏感，中共當局時常利用這個話題挑動民族主義情緒。但是，中國在西藏執行的就是典型的帝國政策。

### 一、一九五零年之前西藏的法律地位

1720年滿清帝國的軍隊首次來到西藏時，西藏的獨立地位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在此之前滿清皇帝跟達賴喇嘛之間是一種供施關係，滿清政府也是以這種關係作為基礎，根據藏人的要求協助驅逐入侵者。滿清軍隊護送達賴喇嘛到拉薩，這個事實可以用來說明清朝皇帝是作為施主和護法主在履行供施關係中履行義務。

清朝臨時指派一位欽差大臣，“監督”西藏恢復有效的管理，也是基於保護者的身份和義務。在第一次介入之後，西藏一如既往自主決定包括外交等大部分政府事務，即使在防務方面，滿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監督”。

1908年-1911年，曾發生過滿清對西藏的軍事佔領，但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抵抗活動始終沒有停止，並最終打敗並趕走了滿清的軍隊。這個歷史不僅不能損害西藏國家的繼續存在，而且還表明西藏跟滿清皇帝之間名義上的關係完全終結。

1911年到1913年，清廷官員和軍隊被陸續逐出西藏，達賴喇嘛重返西藏，他的政府恢復了對西藏的有效控制，同時西藏放棄了極端閉關獨立的政策，尋求與英國保持密切關係。1913年以後的40年裡，西藏不僅完全恢復了獨立的地位，而且一直具有構成一個國家的條件而自立於世。

1950年10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兩個半週後，中國政府宣布：“人民解放軍部隊奉命開進西藏，使三百萬西藏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壓迫，鞏固中國西部邊境的國防。”問題是，中國軍隊是“進入”還是“侵略”西藏？首先，在中國軍隊“進入”（或者侵入）西藏之前，西藏存在一個合法的並對西藏進行有效管轄的政府，這個政府沒有邀請中國軍隊來，並在中國軍隊到來之後向聯合國控告。西藏政府在給聯合國秘書長的信中說：“秘書長先生：西藏人民深知阻止不了中國人的進攻，因而已經接受了與中國政府進行和談。西藏人不能不經一戰而低頭屈服，但始終熱愛和平的西藏人民要抵抗嫻熟於戰爭的中國軍隊似乎並沒有戰勝的希望。但我們相信不論世界的任何國家發生侵略戰爭，聯合國都會制止。”

薩爾瓦多政府要求聯合國對西藏的報告進行討論，美國和印度也都支持。薩爾瓦多政府代表指出：“中國無端侵略了西藏，這個地區雖然有一段時間是中國的保護國，但至少從1912年開始是一個完全享有主權的國家，如果聯合國對這種侵略行徑不予譴責，則應視為是聯合國的失職。”

1950年12月，美國也首次發布了對西藏地位問題的官方立場：“美國是首先支持人民自決理念的國家之一，因此美國相信西藏人民也和其他民族一樣享有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固有權力，而且在情勢發展必要時，也可以考慮承認西藏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從以上材料來看，毫無疑問，中國軍隊對西藏的軍事行動更符合侵略的定義。

## 二、十七條協議的法律效力

1951年，西藏政府派出由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15人代表團赴京與中國政府談判。因為這是在大兵壓境武力威脅之下的談判，達賴擔心代表團可能會在威逼之下不得不屈服，所以沒有授予全權。而是命令和談代表凡是重大事情都必須報請拉薩或者在亞東的臨時政府做出決定。正如達賴所料，西藏代表果然在壓力下在所謂十七條協議上簽了字。但是和談代表聲明：“我們僅僅是代表個人簽字，我們沒有權力代表達賴喇嘛或者西藏人民在協議上簽字。”當時和談代表沒有帶對簽署協議至關重要的政府印章，而蓋在協議文本上的西藏政府印章是中國人在北京製造的贗品。

協議包括一個序言和十七條款項，其中包括給予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以及由中國政府掌控西藏外交與國防事務的權力；中國政府則承諾不改變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固有的地位和職權。協議規定西藏人民有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表示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有關西藏內部的改革不加強迫，而是

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式解決之，同時還規定為了保證協議之執行，成立了一個包括愛國藏人在內的工作小組等。

上述消息讓臨時首府亞東和拉薩感到震驚，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均表示無法接受這個協議，和談代表也未被授予簽約的權力。但是出於種種考慮，達賴喇嘛也沒有公開出面否定協議。9月9日，三千中國軍隊進入拉薩，不久由張國華將軍率領的兩萬中國軍隊也進入了拉薩，從新疆進入的西藏的中國軍隊則相繼佔領了日土、噶妥、江孜和日喀則等重要城市，並在西藏東部和西部聚集了大量軍隊，實現了對西藏的軍事佔領。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已經無意再就十七條內容跟西藏談判，達賴喇嘛和他的政權也除了接受協議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因此張經武代表達賴喇嘛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達賴喇嘛已經接受了協議。

達賴喇嘛1959年流亡到西藏後發布聲明說：“雖然我和西藏政府從未自願接受協議，我們仍被迫接受並遵守協議，以免西藏人民和西藏遭受徹底的毀滅。”十七條是在中國軍隊強佔西藏領土的狀態下簽署的，中國政府嚴重違背了國際法原則：第一使用武力；第二、強迫簽署條約。這就影響到十七條協議的法律效力。國際上《放棄戰爭通約》（也稱1928年的基洛格-布里安條約，中國政府也是簽約國）規定：“第一條：所有本條約之簽署國鄭重地宣布，不得為解決國際爭端而訴諸戰爭，在各國交往中不得將戰爭視為國家政策的一種工具。

第二條：所有本條約之簽署國都同意對各國彼此間可能出現的爭議或鬥爭，不論其初始原因或性質是什麼，都只能尋求和平方式尋求解決。”這些基本原則不僅為19個簽約國所堅持，而且其主張也在隨後的聯合國大會上得到肯定。

中國政府一直以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為理由，為中國軍隊侵入西藏辯解。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麼朝鮮、越南和緬甸等國，在歷史上跟中國的關係比西藏深遠得多，為何不是內政問題？

條約的簽署必須出於各方的自願，強迫簽署的條約沒有合法性。換言之，以威脅手段強簽署的協議無效。中國政府也在建政後宣布所有滿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國民政府跟外國政府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均屬無效，中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它的依據也是這個國際法的原則。

由上理由，中國軍隊對西藏的入侵，不論從習慣法還是國際條約都是非法行為。中國的行為已經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包括侵犯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以及禁止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

鑑於存在著以上這兩個法律上的障礙，《十七條協議》顯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成為否定西藏獨立國家主體的法律地位的理由。

### 三、名存實亡的民族區域自治

1959年西藏人民發動起義，以付出數萬生命的代價被殘酷鎮壓，達賴和主要政府成員被迫流亡印度。周恩來宣布解散西藏政府。從此，西藏徹底淪為中國政府的鐵血統治之下，跟內地的一個省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中共統治至今，大概造成了100萬藏民的非正常死亡，另外還至少100萬人因為宗教信仰和言論曾被判罪關押。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大量漢人入藏。在西藏的東部，漢人的數量甚至遠遠超過了藏人。在達賴的故鄉，中國政府的統計是漢族250萬，藏族75萬。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中國政府的資料顯示漢人的數量也還是超過了藏人。目前中國政府已經殖民750萬漢人到西藏，這些還不含在藏區的30-50萬中國軍隊。藏族這個獨特的民族，正在像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被漸漸同化。

西藏的人權問題之嚴重也是世界矚目的，也可以說是最嚴重的。西藏的所有權力都被中共黨和中國軍隊把持，雖然也有極少數的藏族人能進入政府和司法機關，但是他們對權力的掌控和對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無數的藏民因為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被關進監獄或者勞改營。

西藏的自然環境和宗教文化一樣受到毀滅性破壞。西藏原來是個具有獨特自然環境的佛國。中國軍隊入侵之後的數十年來，這裡的動植物遭到嚴重毀壞，環境急劇惡化。西藏作為世界上最後一塊純淨、和平的雪域高原，正在淪為環境、宗教、文化面臨毀損滅絕的境地。中國政府在憲法上規定西藏是個民族自治地區，但是自治卻成了藏人的夢想，也成了中國的最大謊言。

### 四、西藏的主張：中間道路

雖然西藏謀求獨立沒有任何法理障礙，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還是採取了尊重現實政治的策略，不再謀求西藏的獨立，而是提出走“中間道路”的主張。所謂中間道路，指的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處的地位或狀態，也不尋求西藏的主權獨立地位，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實施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對西藏而言，中間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之保護、延續與發展；對於中方，中間道路可以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統一；而對於其他鄰國或第三國來說，中間道路可以促進邊界的和平安寧，推進國際外交活動。中間道路的核心

價值是實現西藏的真正自治而不是徒有虛名的自治，同時又不脫離中國。

達賴喇嘛提出中間路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79年對西藏談判代表說的話：只要不提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中國著名作家，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王力雄先生曾對媒體說：“我是讚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的。我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一個較好的辦法。但高度自治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由人民選擇他們的領導人。現在的西藏名義上也自治，但官員都是北京指派的，那麼怎麼可能自治呢？”

針對北京當局攻擊達賴喇嘛主張大藏區，係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說法，王力雄駁斥說：所謂領土要求也是在中國境內，如要把藏區合在一起，只是行政區劃重新劃分，並不存在領土問題。所以，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連當年陳毅都說過，可以考慮將藏區合併在一起。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相互不相容的問題。

筆者認為，達賴的中間道路是目前處理西藏問題的最溫和、最現實的方案，既照顧到了歷史因素和藏民的感情因素，也照顧到了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是為西藏的和平和自由，為藏民的長遠利益和福祉提出的偉大構想，非具有悲天憫人襟懷的達賴，很難想像還有誰能提出這麼具有包容性和現實性的方略。但是中國政府卻不惜食言自肥，百般曲解、污衊達賴的建議，達賴特使跟中國政府舉行的七次談判，均因為中國政府缺乏起碼誠意而無果而終。

2009年2月16日於紐約

## “中間道路”是“雙贏”之路

文/李江琳

“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基於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是兼顧了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切實可行的，也可以作為未來製度轉型中打開僵局的金鑰匙……

### “中間道路”是巨大的讓步妥協

三十多年前，達賴喇嘛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方案，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擁護。此後，達賴喇嘛的這一主張從未動搖過。所謂中間道路，就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現狀，要求改變，但是不尋求西藏的獨立，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名副其實的自治。

“中間道路”對於西藏民族來說，首先是一個巨大的讓步和妥協。在歷史上，一直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為止，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這一政府有其獨特的權力結構，獨特的傳承方式，領導著一個完整的國家。“西藏地方政府”這一說法，一直要到1951年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城下之盟”時才第一次出現。所以，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流亡藏人的政治訴求是西藏的獨立，這一獨立訴求是有其歷史依據的。而“中間道路”則明確地放棄了這一獨立訴求。

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不只是從現實政治的力量對比出發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讓，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講“無常”，承認世間一切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變動之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怎樣對待這種變動，考驗著每個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提倡每個人審視自己的動機，要求自己懷著善良的動機，做的事情不僅對自己有利，也要對他人、對各方都有利。基於佛教哲理的“中道”是通過放棄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此保證有關各方必要的利益，從而避免各方長遠的衝突。對藏人而言，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治主張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得到保護、延續和發展，同時也保證了中國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要求，而且對鄰國而言，“中間道路”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區域安全。

### 胡趙之後關上了漢藏對話大門

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提出放棄獨立訴求的“中間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7條協議”簽訂後不到10年，中共就在拉薩發動戰爭，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噶廈政府被取締，實現了毛澤東1950年1月2日從莫斯科發出的電報中，要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這一預定目標。自1956年至1962年，藏民族經歷了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根據官方資料，藏人口損失至少達總人口的10%。數千年裡積累的寺院和民間財富被掠奪殆盡，寺院大多數被拆毀、佔用，四大法王皆流亡海外。在這樣的情況下，藏人普遍要求獨立不僅是自然的，也是正當的。

達賴喇嘛流亡後不久就在思考怎樣從當時極端困難的漢藏關係糾結中找到解脫的途徑。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在討論這一問題。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向流亡藏人發出“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的信息，達賴喇嘛正式向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提出了“中間道路”的主張。從此以後，藏人的這一主張從來沒有動搖和改變過。

正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張，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漢藏關係的緩和氣氛創造了條件。但是，隨著胡耀邦、

趙紫陽等開明改革派的政治失勢，中國政府轉而採取十分強硬的立場，關上了漢藏對話的大門，並且開始攻擊達賴喇嘛個人，使漢藏關係迅速降溫到了冰點。這就是如今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民族關係非常緊張的起因。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存在著非常嚴重的侵犯人權的事情。年輕藏人僧俗的接連自焚抗議，使得中國政府已經不可能向全世界隱瞞藏區的真相。中國政府的“治藏”方針是不惜一切代價的“維穩”。這種“維穩”將會使藏區的人權狀況更為惡化。

“治藏”官員們公開宣稱，他們是要用拖的辦法，拖到達賴喇嘛去世，指望一個沒有達賴喇嘛的西藏會更容易治理，西藏問題將自然而然地消失。

### 民族自治關乎中國民主轉型

這種想法，就像指望“維穩”能夠讓中國的政治狀態會永遠延續下去，不必改變一樣，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中國的政治制度，看似強大，實質有其十分脆弱的一面。它不僅缺乏糾錯機制，而且有一種“錯了必須更錯”才能維護下去的特點。最近的重慶事件又一次證明，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多年，仍然沒有解決領導人如何接班的問題。當政者都不得不考慮，接班人上台後是否會“挖祖墳”，即糾正前任累積起來的錯誤。事實證明，鄧小平的“欽點”和“隔代欽點”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接班”仍然是“政治危機”的同名詞。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和民間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的方向要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保障人權，提升民主。制度轉型一旦啟動，言路開放，民眾訴求有了表達的途徑，邊疆民族問題必定隨之浮出水面，西藏問題將首當其衝地成為未來中國政治制度轉型過程中的重大議題。這一議題解決得好，邊疆民族問題就能以其為樣板得到妥善解決，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成功的機率就大，反之，這一議題得不到解決，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必定處於不安定之中，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成功的機率就大為降低。邊疆民族的自治訴求，和中國民眾的民主訴求，有本質上的一致性。如果邊疆民族得不到他們要求的自治，中國民眾就得不到他們要求的民主。

到那個時候，中國民眾就能看到，達賴喇嘛的“中道”理念和“中間道路”的政治主張，對於中國未來的意義。“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基於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是兼顧了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雙贏的，也是切實可行的。這一理念和主張，也可以作為未來製度轉型中打開僵局的金鑰匙，那就是雙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協和讓步，來尋找共同接受的解決辦法，爭取雙贏，避免你死我活的爭鬥。

## “中間路線”是化解民族矛盾的良方

文/張菁

2009年8月初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漢藏會議”，中國官方媒體指這是海外民運人士和“藏獨”的合流，這有點搞笑，因為這百來人中，就本人所認識的華人媒體同行與會者就不下20人，分別來自港台和各個國家，其中有長期在報刊雜誌上寫時評、公認的“親共”老報人；也有人民日報海外版、新華社等媒體人員不定時輪流與會。除了20來位藏人外，其餘都是抱持各種不同觀點的學者、教授、研究員，評論員，當然，也包括了有民運人士背景者，但把這些人統統歸類民運人士，把一直強調“不要獨立”的西藏流亡政府歸類於“藏獨”，擺明就是故意混淆視聽，挑動民族對立情緒。

說實在，被歪曲的感覺並不好。長期以來，中共的輿論導向是，凡不擁共的，就歸類“不愛國”；凡指出政權體制問題的，就是民運人士；不認同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同情被打壓的宗教團體，就是“藏獨”、“疆獨”、法輪功；一旦被貼上標籤後，發動黨媒、官媒全力抹黑，居國內者，住地街道、公安紀錄在案，三天兩頭被強迫拉去“喝茶”，或乾脆打入大牢；身居海外的，則拒發回國簽證或護照，等你老死他鄉異國終不得與親人團聚，除非你“態度端正”、“聽打招呼”，而對很多人來說後者無異於“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凡此種種，都難免會讓蒙冤者要說清楚、講明白。

在會議期間，有一件小事令我記憶深刻，那是最後一天全體與會者討論“共識”，坐我旁邊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舉手發言，但因人多時間短，發言者通常只有一次機會，她想第二次說話，但沒有成功，我問她想說什麼？她說：我覺得在這份達成共識的文件上，關於支持達賴喇嘛“中間路線”的後面，應該加上一個註解，即簡單說明什麼是“中間路線”。我納悶，這不明擺著的嘛，“中間”就是在“獨立”呼聲和現實西藏的狀況下，尋找一個中共和藏人都能接受的平衡點，一方面，達賴喇嘛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實行真正高度自治，國防外交由中國處置，不要求獨立；另一方面，讓流亡在全世界的藏人回到自己的家園，以自己的文化、習俗生活，結束數十年背井離鄉的流亡生涯，而且達賴喇嘛本人及流亡政府千遍萬遍的重複著這個訴求，全世界都聽懂了，還需要在這裡加註釋嗎？她說，在國內，老百姓知道的“中間路線”，基本上就是獨立的概念，如果不加特別說明，就容易被認為是我們在支持“藏獨”。

真驚訝中共封鎖資訊、篩選新聞的能力，這已經大大超出了我之前的想像。

曾經像很多中國人一樣，我一直以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

中國的一部分，但到國外後，從大量的歷史資料文獻中發現，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說到中藏（吐蕃）的歷史淵源，要算公元600多年的讚普（意國王）松贊乾布在位時期是最好和最穩定的。那時佛教開始傳入西藏，加上唐皇遠嫁文成公主，松贊乾布再娶（其妻為尼泊爾的赤松公主，一說還有原配的藏人妻子），兩國基本相安無事數十年。但是松贊乾布死後，戰亂再起，公元710年，唐皇再嫁女割城，以求和蕃，但金成公主效應也不過維持了數十年。763年蕃王直攻長安，佔據唐都15天，最後簽盟約、金帛巨億相送方肯收兵。

唐蕃多次盟約中，最為著名的是至今仍矗立在拉薩大昭寺前、始於821年、竣工於822年的和好碑文，史稱“長慶會盟”，亦稱“甥舅和盟”。這個以藏中兩種文字風別刻在三個石碑上（另外2塊分別在當時的長安城和藏中邊界格格日山上）的條文，清楚寫明了兩國之間的關係和責任：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與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讚……。蕃漢二國，各守見管本界，洮泯以東，大唐封疆，其塞以西，盡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給以衣糧放歸。……。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其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於）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請為知證。如此盟約，各自契陳。……。”（見國際律師、教授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所著《西藏的地位》）

一直到842年，吐蕃最後一位贊普被刺死，吐蕃國內大亂，出現4個政權，統一強盛2個世紀的吐蕃王朝，開始衰落，同時也走向全面大規模的佛教治國之路，不再熱衷於政治和軍事擴張，藏人從南部和西部外的邊界退回或被趕出，也從此再沒有跨出自己邊界。

牛津大學教授、印度西藏史學家FW Thomas指出：在抑制人們的殺戮精神與殘酷心態方面，沒有任何宗教比佛教更為有效。而今天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及其政府所倡導的和平之路便是最好的印證。

在強國面前，中國歷代帝王只有在國家最危急、最不得已之時，才會遠嫁女兒，以和親為名實為妥協求安，皇族千金決不會隨便下嫁到“蠻夷”之地，況且一別可能就是永別。較完整的記載，此招美人計開創自西漢初年，多位宮女充皇親國族遠嫁西域各國，以圖聯合各小

國攻打強大的匈奴，後來漢高祖劉邦更嫁走了2位皇室公主，其中昭君出塞會炙人口；隋朝為發展與突厥關係，也與突厥可汗聯姻。武則天稱帝時期，突厥可汗默啜大敗唐軍，提出招婿上門以和親，遂以非皇族的武延秀充數，事敗後使者被殺，突厥再犯，唐王人財兩空。

另外，中國各朝代，包括最昌盛的大唐帝國都曾在不同時期向周邊國家進貢，先後得到中國進貢的有匈奴、突厥、吐蕃、回紇、遼國、金國、蒙古等。這些國家歷史上不僅不屬於中國，甚至曾滅過中國。也有不少今天依然是獨立的國家長期向中國各朝代進貢，如日本、朝鮮半島列國、越南、文萊等。因此，進貢國不一定是弱勢附庸，受貢的不一定是永世強國。歷史上所有比鄰的國家，打打停停、分分合合是正常現象，人類社會也是在歷經無數次滅亡和復興中得到發展。

中國一些歷史學家們把統治或滅亡過中國的歷代外國和外族人，無論時間長短，都一律列為“我們的祖先”，如把滅了中原、橫掃歐亞大陸的“只識彎弓射大雕”者，當作我們的祖先和永恆的驕傲。事實上，成吉思汗及族人無論人種、歷史、文化、語言、習俗，與漢人八竿子都打不著，本是蒙古人之光，何來中華的驕傲！其實，榮辱之間，我們偉大古老的傳統文化早有定論，成者為吾王，敗者以為寇。而君王者天下最大最親，社稷尊崇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優良”文化在抗日戰爭中發揮至極：近百日本兵，押著我五萬國民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沒有反抗，只有悲壯和血流成河。但是對弱者，我們是一群魯迅筆下痛打落水狗的小人，因為狗沒落水前是強勢勇猛，誰都不敢動。對周邊弱小國家及民族的蠶食、同化和掠奪，在共產黨領導下，更顯“本色”，如1979年毫無理由的攻打小越南；以統一語言為由，逐步滅絕其他語言文化，如滿、蒙、藏語等，將藏人的精神領袖隔離在家園國門外等等。

在西藏問題上這種恃強凌弱的特性尤其突顯。中共在與達賴喇嘛代表多次談判中強調，達賴喇嘛必須首先要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當然達賴喇嘛不會違背良心和背叛歷史來說這種話，甚至任何一個研究歷史並負責任的人也不會說這種話，中共不僅擺明沒有誠意，更欺人太盛！藏人信佛，走非暴力和平路線，加上國破勢弱，中共就極盡欺辱之能事。事實上，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是藏人最低標準和最起碼的訴求，即便這樣，也被歪曲成了“藏獨”，作為拒之千里的藉口。其實，相信中共也心知肚明：人家“不獨”只是讓理，“藏獨”才是有理。

中國文化的糟粕部份被今天的中共統治政權發揚光大，中共靠著暴力和欺騙奪得政權，同樣也是靠歪曲事實和謊言來維持政權，中共建制60年來的歷史早已說明了這個不爭的事實，因此中國人不應該單單沉浸在“經濟崛

起”中，更需要“道德覺醒”，突破中共的一家之言，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面對良知，正視這樣的史實：中國曾經歷過遭他國滅亡，也曾侵占過其他國家，中國的版圖正是在這種蠶食中得以擴大。可是今天，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共同的價值觀是朝向和平和解這條路上走去，以暴力搶奪殖民屬地的“西方列強”也早已陸續歸還各國主權，而在經濟上要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的中國，是否也可以在維護人類道德、免除戰爭、飢荒、流亡等方面與他們平起平坐呢！

我們已經看到，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正是著眼於這個基本點，是中藏問題現實中尊重他族又利己的雙贏原則，是中藏雙方最能達至和平互利的一劑良方，這個大原則不僅適合於西藏，也可作為其他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的參考原則，對“中間路線”一味採取歪曲抹黑，顯露的是中共的流氓無賴和無自信。

## 「中間道路」的本質、歷程及其成果

### 一、引言

「中間道路」是一個尋求雙贏、公正地為一切有情眾生的安樂著想、以「正義、慈悲、非暴力、友好、妥協、互利」為原則、充滿寬容與豁達的政策。

公元1959年，達賴喇嘛及八萬多藏人被迫流亡國外後，由於處境嚴峻，曾有一段時間致力於給青年人提供教育機會，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安置難民等問題，雖然未能對西藏未來的政治地位做出一個明確的政策規劃，但從公元1967 - 68年開始，達賴喇嘛對國際國內情勢做出全面審視和深思熟慮的同時，與當時的議會議長、副議長、噶廈有關人員及博學專業的西藏友人進行深入討論後，於1974年確定了待藏中之間時機成熟而進行和談時，不追求政治獨立，而是爭取名副其實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

1979年，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藏中和談的建議時，由於我方對此早有規劃，因而很快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從此，我方雖堅持「中間道路」的立場，為和談解決西藏問題而做出的努力可謂是百折不撓，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不僅未做出任何正面的回應，反而使西藏的局勢日趨惡化。從1987年到1989年間，西藏境內發生多起藏人和平抗議活動，在對此進行鎮壓以後，中國政府加緊對西藏民眾、尤其是對實踐宗教的僧眾進行嚴密的控制，並以「愛國愛教學習」等名義持續進行忍無可忍的挑釁騷擾，從而最終導致了2008年遍及整個西藏的藏人抗議運動。而中國政府對此的鎮壓、殺戮、監禁和酷刑虐待等慘無人道的行為至今仍在持續當中。同時，中斷九年之久的藏漢和談雖然於2002年得以恢復，其後雙方前後進行了九次接觸商談，但因未達成任-----下接26页

## 專訪達賴喇嘛中文秘書才嘉- 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到底是什麼？

文/VOA 中文部

**華盛頓—**最近，西藏問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2月21號，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會見了正在美國訪問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達賴喇嘛多年來倡導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表示支持。3月6號，達賴喇嘛為美國國會參議院全體院會主持祈禱，次日，又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發表演講，以此結束對美國兩個星期的訪問。此後，中國的國家媒體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進行了嚴厲的抨擊。在達賴喇嘛訪美期間，VOA衛視時事大家談主持人寶申於3月6號採訪了他的中文秘書才嘉，請他解釋“中間道路”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它包括哪些內容。以下就是採訪的文字版本。

**寶申：**才嘉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美國之音VOA衛視的採訪。

**才嘉：**謝謝你，謝謝。

**寶申：**我們知道，奧巴馬總統2月21號在白宮會見了達賴喇嘛尊者，這是奧巴馬任內第三次會見達賴喇嘛。您作為達賴喇嘛的中文秘書也參加了會見。在會見中，奧巴馬總統對達賴喇嘛多年來一貫倡導的“中間路線”表示支持。次日，新華社發表了署名文章，對“中間道路”進行了抨擊。首先，我想請您給我們的電視觀眾解釋一下“中間道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是怎麼形成的，它的內容有哪些？

**才嘉：**其實我覺得這個“中間道路”的主張，它的最根本的一個精神應該可以用很簡單的話來闡述，就是說，西藏這一方不爭取西藏獨立，不爭取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這麼一個主張。然後呢，我們也不接受現在中共對西藏的這種實施方式，我們去選擇一個的中間道路。也就是說，我們尋求一個真正的，名副其實的西藏自治，而這個自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框架之下的一個自治。中間道路，簡單講的話，它的一個精神，或者它的宗旨就是這麼一個說法。

**寶申：**新華社的評論文章說呢，達賴喇嘛不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在外國占領下的一個國家。達賴喇嘛對西藏的地位和歷史究竟是怎麼看的？

**才嘉：**您剛剛談到的這個自古以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說法有點奇怪。那說自古以來到底是什麼時候？自古以來中國有嗎？有中國這麼一個國家嗎？所以這個陳述的方式上還是有它的問題，我曾經了解到，

中共的說法有些變化。有些時候他說，13世紀的時候，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有時候他們說，自元朝以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有時候又說是自古以來。我覺得這個歷史的部分呢，應該由歷史學家去定論。但是最關鍵的一點呢，我覺得“中間道路”的精神不是去追蹤過去的歷史是什麼情況。它最關鍵的，最在意的，就是未來西藏前途的問題。達賴喇嘛也多次強調，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要去糾纏它，因為很多歷史的事情是很複雜的，歷史的問題沒有辦法改變。也就是說，達賴喇嘛講一句話：沒有辦法否定歷史，我們在意，我們注重的，是未來的發展，我覺得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寶申：**新華社的評論文章另外一個指責呢，就是達賴喇嘛試圖搞所謂的“大藏區”，把中國版圖四分之一的土地都納入這個大西藏的範圍之內，其中包括青海、四川和雲南，還有其他中國的一些省份，或者說自治區的這麼一些地盤，然後在這個地盤上搞一個國中之國。請您解釋一個所謂“大藏區”的概念是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概念是達賴喇嘛首先提出來的嗎？

**才嘉：**不是，我們覺得在我們的這個所有的公開的文件裡面，從來沒有提出“大藏區”的概念，而“大藏區”這個概念，應該說是中共相關部門--可以是統戰部啊，或者是宣傳機構--他們扣的一個帽子。就是說達賴喇嘛或者是西藏這一方他們在搞大西藏。其實這個“大藏區”，因為藏區沒有大小，它只有一個，那我們所講的就是說所有的藏區，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跟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規定的，所承認的所謂的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的法律所承認的區域，沒有什麼大小西藏之分，也沒有什麼大小的藏區之分。所以呢，我們從來沒有提大西藏，也沒有提小西藏，我們提的是所有的藏區。

**寶申：**但是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網頁上看到了所謂西藏三區的說法，包括衛藏、康區還有安多，這和所謂的“大藏區”有任何重疊的概念在裡面嗎？

**才嘉：**這個實際上就是所有的藏區，包括在西藏三區裡面，當然有時候我們談到西藏這個概念的時候可能在定義上有些含糊不清。現在很多人覺得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區。但是呢，在英文和藏文裡面Tibet就沒有任何混淆的地方。就是說，這是藏區。您剛剛提到的衛藏、安多和康區實際上它就是所有的藏區。這是一個歷史上一個稱呼而已，但是實際上，它現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之下的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範圍之內。

寶申：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篇就是過去西藏的中共高官、曾經擔任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的平措汪杰先生在寫給胡錦濤的一份信中就談到過藏區統一自治的問題。他說，早在五十年代，一些西藏的中共的高官向中央提出過統一藏區這樣一個想法。其中它包括的地區就是很多現在劃歸青海、雲南、西川等等一些省區的這麼一些地方。他們當時認為，這樣的話對西藏的進步是有好處的。中央代表團原則上表示同意。而且，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先生在在拉薩的一次高級黨的干部會上也說，這個說法很好，西藏將來可以分別的聯合起來，這樣對於西藏發展，對於藏漢民族之間的關係也有好處。您是怎麼理解當時這一段歷史的？

才嘉：我知道這段歷史，而且平措汪杰之前給江澤民和胡錦濤也寫過信，談到的也就是您剛剛所說的這個，我們也是知道的。這個情況在五十年代的時候當時在十七條協議裡面有提到西藏要成立軍政委員會，但是後來毛澤東覺得西藏的情況跟其他的中國的地方是不一樣的，特別跟其他的少數民族地方也不一樣，西藏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這是當時毛澤東跟當時的中共的這些領導他們共同的認定。這個認定有了以後他們覺得，西藏要成立這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那麼這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您剛剛談到的，當時的中共的高官陳毅到拉薩的時候，據我了解還成立了一個小組。當時這個小組裡面呢還有當時的藏族的共產黨員、老紅軍天寶，這麼一個人，藏人的名字叫桑吉悅希。以他為主成立一個小組討論是不是把所有的藏區，我們所提的所有的藏區統一起來作為一個自治區，這樣對中央的管理，以及西藏的整體的發展是不是有幫助。因為這樣分開的話，這個對西藏民族的援助、對西藏民族的發展，包括對西藏生態的保護等等是不是更好，就是說，統一起來是不是更好。當時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據我們了解。可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因為中國後來也發生很多問題，這個想法沒有實現。

寶申：所以可以說“大藏區”的這麼一個概念也不是達賴喇嘛尊者他首先提出來的。

才嘉：對，這很清楚。

寶申：我們知道新華社的文章還指責達賴喇嘛搞所謂的“高度自治”，就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自治法。但是您剛才談到，達賴喇嘛還有其他的一些藏族人士所主張的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和“高度的自治”之間有什麼區別？

才嘉：我覺得，我們沒有使用“高度”這個詞，因為“高度自治”這個我覺得在憲法第三十一條下對香港的一

國兩制的時候提出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麼一個概念。但是我們沒有用“高度自治”這個詞，我們用的就是真正的自治，也就是名副其實的自治。因為這是我們公開的文件裡面，是達賴喇嘛所有的公開的講話裡面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們剛剛談到“中間道路”，我剛剛也提到“中間道路”的宗旨，就是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精神以及它的框架之下尋求西藏的真正的自治。那所謂的真正的自治是什麼呢？我們最關心的是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西藏的語言以及西藏的民族特性，還有西藏脆弱的生態環境。這個保護呢不僅對西藏，對於整個中國都是一個好的事情，一個正面的事情。我們最關心的是這個。那麼最重要的關鍵的一點呢，我想特別是華人的觀眾、聽眾朋友最需要了解的一點，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最關鍵的一點是沒要分裂中國，沒有說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那在這個前提之下，你要為了發展西藏、為了保護西藏既有的傳統的文化，你把藏區做成一個什麼樣的自治，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沒有關係的。如果你要把西藏分裂出去，西藏要獨立的話，當然這樣中共的官員，中共的華人可能不接受，但是關鍵是我們沒有分裂，我們沒有獨立啊。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之內，我們說藏區應該怎麼發展，藏區應該怎麼去保護它既有的傳統的文明，那麼關鍵是這一點。

寶申：關於高度自治，我記得八十年代在北京採訪的時候，十世班禪也多次提出要在西藏實行真正的自治。他在全國人大會上也經常談到，回到西藏視察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說。那麼這個真正的自治是不是和現在由於西藏沒有真正的實行藏族自治所引起的一種說法呢？

才嘉：對，我覺得這個顯然很清楚。因為我們為什麼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現在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裡面有很多自治的條款在裡面，但是這些條款這是書面上的，它沒有真正的落實在實際生活當中。比如我們舉個例子，從宗教自由的方面來講的話，它憲法裡面有宗教自由，但是在藏區，有宗教自由嗎？很清楚，是沒有的。我們舉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達賴喇嘛的照片。達賴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領袖，但西藏掛一個達賴喇嘛的照片都是要被關進監牢的，在那邊都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在這麼一種情況之下，這個宗教自由是可想而知的。還有一點，我覺得最關鍵的，我們也最在意的，就是西藏的語言、文化，就是文字、語文。那西藏語文在藏區它的地位是非常的脆弱，也就是說，你在小學，可能有藏語課，但是實際的運用呢，你藏語是沒有用的。因為我曾經也當過老師，我自己有親身的體會，你藏語學的再好，用藏語學了數學啊、化學啊等等，但是你高考的時候沒有一張考卷是用藏語的。實際在當地招工、招乾的時候，不可能用藏語去考試。所以我們在實際的生活當中，藏語被邊緣化了。所以西藏的語言跟文化的保存遇到了很大的，可以

說是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最在意的就是真正自治裡面語言文化的保護，這是我們很在意的。還有就是宗教自由，對西藏人來講，他注重精神大於注重外在的物質。我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

**寶申：**新華社的評論文章還指責達賴喇嘛說要把其他的所有的民族都趕出藏區，達賴喇嘛本人有這種想法嗎，有這種主張嗎？

**才嘉：**沒有這回事，我覺得“中間道路”，達賴喇嘛不尋求西藏獨立，尋求真正的自治的中間道路的精神可以說在1974年的時候就講出來了。那70年代的時候，他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74年的時候他在我們內部開會的時候他提到了，說未來解決西藏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和中央政府談判。如果要談判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選擇一個不分裂中國的道路，不然你要爭取獨立的話，中央不可能跟我們談判。那談判的話，對話的話，唯一的我們尋求真正的自治。當時中國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後來79年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跟達賴喇嘛的哥哥見面以後，鄧小平當時提出來，只要你不爭取西藏獨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所以當鄧小平提出來這個議題的時候呢，我們其實在1974年就做好了準備，我們就以“中間道路”的方式開始談。但是“中間道路”經過這20多年來的調整，它的政策和內涵有一定的正面的發展，但是您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確實沒有說，所有藏區的，不是藏族的民族都要趕出來，沒有這回事。我們最在意的就是我剛剛提到，保護西藏的民族的特性，外來移民，如果超過當地的居民的話，那對這個保護文化是有衝擊的，你懂我意思嗎？意思就是說，外來的民族的人數超過了當地的藏族人口的話，那你所謂的藏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就不是名副其實的。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是有一點在意，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說居住在西藏的其他民族在西藏獲得真的自治以後要讓他們離開，沒有這回事。

**寶申：**因為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網站上也看到就是要停止向西藏地區進行更多的漢人的移民的這麼一個呼籲，指的是這麼嗎？

**才嘉：**對，我們提到的就是有計劃的移民，那這個移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曾經在50年代的時候，我記得做過這種移民，但是呢，因為當時的天候、環境不適應，很多這些移民的，當然沒有在西藏自治區裡面，大部分在青海藏區、四川藏區，中央當時做了大批的有計劃的移民，在那些牧區進行開墾、開荒，做過這麼一些大的努力，但是因為天氣、環境的不適，都沒有成功。我覺得這種有組織的移民，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像剛剛提到的，我們最在意的就是說，比如說一個自治縣，你是藏族自治縣，當外來的人口超過了藏族人口的話，那這個少數民族的自治就不存在了。所以呢，這個是我們

最在意的。加上這樣的話，當然還有很多利益的部分，因為一個自治區，我們也是在意除了文化以外經濟的發展、當地生態的保護等等。移民越來越多的話，會衝擊到當地民眾的生態，特別是在經濟上因為藏族民眾的本身在商業上不是專業化的問題下呢會邊緣化等等，有這樣的問題，這種是在政策方面的問題，我覺得這個不是關鍵的。當西藏真正的名副其實的自治落實以後，我覺得這些技術性的問題是可以討論，是可以改變的。

**寶申：**這署名文章還指責，達賴喇嘛呼籲把西藏建成一個國際和平區，說是達賴喇嘛不要讓中國人民解放軍再駐紮在西藏區域內，達賴喇嘛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想的，他為什麼提要建立一個國際和平區？

**才嘉：**我覺得達賴喇嘛當初提出和平的區域的時候應該是在1988、89年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在美國國會發表的一個演講以及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提出來的一些建議裡面，他有這種建議、有這種願景，就是說未來如果西藏成為一個和平區域的話，對整個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印度這麼大的兩個國家，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之間有這麼一個緩衝的地方的話，有利於當地的和平、有利於世界的和平。這是達賴喇嘛的一個願景，不是他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計劃。它是一個願望，也是達賴喇嘛作為一個精神領袖、作為一個和平的導師，他提出來的一個心願，但是這不是一個計劃、這不是一個要求、也不是一個自治，也不是我們尋求自治裡面的一個條款。當然，當時也提出來說，國防跟外交由中央政府主導，其他的西藏人自己去做，那這個國防的話，當然要有駐軍嘛。所以達賴喇嘛的講法和他被指責的這個是完全矛盾的。他們的指責裡面說，達賴喇嘛說，除了國防和外交以外全部要有達賴喇嘛來領導。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說他來領導，由西藏人民自己來做主，但你承認達賴喇嘛說國防的話，國防由中央領導的話，達賴喇嘛怎麼會說解放軍要撤出西藏啊，所以這是矛盾的。所以實際上呢，達賴喇嘛的想法就是說，提出和平區域是他的一個願望，他的一個願景，但是我們在自治條例裡面，特別是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跟中央提交的一個全體西藏民族獲得名副其實自治的一個建議書裡面講的很清楚。

**寶申：**您剛才談到，達賴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方面商談的事，據我了解，從2002年到現在，雙方已經進行了十輪的商談了，請您介紹一個商談的主要話題是哪些，在商談過程中有沒有取得什麼樣的進展？

**才嘉：**我覺得2002年到2011年，您剛才談到的，我們大概相互談論了十次，這個結果呢，基本上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成果。那當然雙方開始的時候是一種交流心得，溝通心得的一個接觸，那到了大概第五第六的時候，開始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我們提到了西藏的真正

的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的部分。後來，中央的代表也提出來說，你們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我們想聽聽，我們想看看，後來我們把備忘錄，就是很詳細的自治的內容，我們最關心的是什麼，我們把這個書面的意見交給了中央，那後來這個中央的代表說這是變相獨立，是半獨立等，他指控這個。那實際上，過去這麼多年來的談判，2005年的時候我們正式的提出說，達賴喇嘛希望去五台山，因為達賴喇嘛在54、55年的時候去過北京，當時他提出說，作為一個佛教領袖到五台山，因為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聖地，到五台山去朝聖、禮佛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達賴喇嘛希望去，但是當時北京說那邊的道路不好，條件不成熟，所以達賴喇嘛沒有去成。所以達賴喇嘛還在一直希望說能去一趟五台山，所以在2005年的時候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也把這個具體的問題提出來，後來沒有下文。所以呢，我們覺得過去的談判呢基本上沒有獲得真正的一個的成果。我不知道中央的骨子裡面是怎麼想的，是不想解決，還是有一部分利益集團覺得拖這個西藏問題，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但是我們是誠心誠意的把真正的我們的想法用書面的方式呈給了中共相關的代表。

**寶申：**也就是說從2011年到現在雙方沒有任何新的接觸？

**才嘉：**對。

**寶申：**現在達賴喇嘛和北京之間有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溝通渠道的存在？

**才嘉：**我們到目前為止，從2011年到現在為止，沒有官方的溝通的渠道，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商人、中國的可以說是退休的一些幹部陸陸續續都會來見達賴喇嘛，特別是中國的佛教徒。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在2012年的年底，達賴喇嘛在印度的菩提嘎雅舉行一個大型的法會一時輪金剛法會。那個時候呢，有大概兩千多的來自大陸的華人參加，這裡面不包括台灣、新加坡、香港還有馬拉西亞的這些華人，純粹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超過了兩千個人，所以呢，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就是中國的佛教徒越來越多，特別是藏傳佛教的人。那這些人來的時候呢，有時候會安排他們單獨和達賴喇嘛見面，那麼這些見面的人裡面也有我剛才提到的知識分子啊、包括商人啊，包括一些退休的干部啊等等，也有一些共產黨員，等等。這些人呢他們也會帶一些訊息，就是說現在中央的政策怎麼樣，他們現在對新一屆的領導的看法，等等。但是呢我們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官方的渠道。

**寶申：**中共的領導層已經發生了變化，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擔任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央統戰部門人事安排也發生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在習近平今後

掌權的這些年當中，達賴喇嘛和北京的關係會改善嗎？西藏問題會出現突破嗎？

**才嘉：**我們希望有突破，我們希望發生變化，因為我們看到習近平上台以後他的一些施政方針、他的一些作為，我們是非常肯定的。特別是達賴喇嘛也在公開的場合他特別的肯定習近平打擊貪污腐敗的決心，他覺得這是可以肯定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裡面後來提出來的很多改革的項目，達賴喇嘛也注意到有一些關於農村、農民的權益的保護，還有一些司法體制的改革等等，而且已經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廢除這個勞教制度等等，還有很多司法，法制層面的部分，達賴喇嘛也了解了這些問題。所以他也在公開的場合裡提到，十八屆三中全會裡面有一些很正面的，包括他很關心的農民、農村的問題，未來可能有機會改善等等。我覺得，從現在這一屆中央領導的做法來看的話，我們希望未來西藏問題，他們能夠面對這個問題，然後呢去解決這個問題。

**寶申：**我們確實看到習近平執政以來面臨各方面的挑戰，有黨內貪腐的問題、有經濟發展的問題、有和台灣的關係問題等等。現在您認為，和這些問題相比較起來，西藏問題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哪裡？

**才嘉：**我覺得首先我們要承認西藏問題的存在，因為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存在的問題。你要逃避它，迴避它，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所以我想中央也知道這個問題。因為過去的中央，胡錦濤時代、江澤民時代，我們是從江澤民時代開始的，2002年，他們也知道有這麼一個問題。不管他們願意解決還是不願意解決，不管他們的這種談判是一種表演也好，是對國內的一個說法，還是對國外的表演也好，至少他們面對了這個問題。我覺得未來的中國領導人應該面對這個問題。而且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是達賴喇嘛健在的時候是很重要的，因為達賴喇嘛是現在西藏的精神領袖，雖然他在2011年辭去了所有的政治責任，但是他依然是西藏人民心中的精神領袖。所以他的影響力、他的說服力是非常強大的。在他在的時候我們去解決的話我覺得這個容易度是比較高的。然後一點我覺得，中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是我覺得西藏問題能夠解決的話，可能對其他問題的解決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寶申：**我看到有些評論人士說，現在北京並不是十分願意和達賴喇嘛進行進一步的談判，希望在他身後，西藏問題就是自然而然地消失。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才嘉：**我覺得北京應該有持這種觀點的人，我覺得這一部分應該是利益集團。據我們的了解，也就是中國的一些學者的研究說，吃藏獨飯的人超過了六十萬人，就是所謂的分裂飯，他們說吃分裂飯的人超過了六十萬。

這個是一個龐大的，當然這裡面也包括藏族的官僚，但最關鍵的問題，我相信像統戰部一樣，這些利益集團他們沒有為國家的前途、命運去著想。他們想到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部分。他們千方百計就是想把西藏問題拖，拖到達賴喇嘛圓寂，這樣的話對他們的利益是沒有衝擊的。他們永遠都可以站在利益的最高點，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央要面對的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寶申：**接下來我想請您談一談達賴喇嘛，因為您是達賴喇嘛的中文秘書，而且據我了解，您和達賴喇嘛的關係非常親密。中國官方的媒體，中國政府經常指責達賴喇嘛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還說是達賴分裂集團等等。請您談一談，跟我們的觀眾來介紹一下，您所了解的達賴喇嘛是什麼樣的人？他在想些什麼？

**才嘉：**我覺得達賴喇嘛他在2011年的時候他完全的退出了政壇，因為之前他從16歲開始自然的成為了西藏的政教領袖，這不是達賴喇嘛的選擇，這是因為西藏本身的一個制度。在公元十七世紀的時候，五世達賴喇嘛的時候，成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的甘丹頗章政權，這個政權從十七世紀的時候開始一直到2011年都是由達賴喇嘛，歷代的達賴喇嘛擔任西藏的政治跟宗教的領袖。但是2011年，達賴喇嘛除了他個人退出政壇以外，他非常堅定的、自願的把將近四百年的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一個制度劃上了句點。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個做法。所以呢我覺得達賴喇嘛他現在的做法，您剛剛提到，他唯一的覺得他有三個責任。第一，他說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人類的一部分，他到世界各地訪問，他接見不同的人，他都是提倡人類的這種善心，就是說提倡人類的慈悲心，人類的愛心，他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人類需要幸福，人類需要安定。人類需要和平的話，關鍵是從每個人做起。每個人的這種愛心，激發他們的愛心。提倡他們的慈悲心是很重要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他說他作為一個宗教領袖，他覺得實際上，七十億人口當中，除了十億人口沒有信仰之外，六十億人口是有信仰的，那說明宗教在人類社會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樣的話他覺得他作為一個宗教人士，宗教之間的對話、宗教之間的和諧、宗教之間的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世界各地區的時候，他會見到很多不同宗教的領袖，他在提倡宗教之間的對話、宗教之間的和諧、宗教之間的友愛。這是第二。第三，他雖然辭去了西藏的政治責任，但是他依然有達賴喇嘛這樣的一個名稱。加上他是一個藏人，他有義務、他有責任，為了保護西藏的文化、保護西藏的宗教、以及我們剛才提到的西藏的語言、西藏的民族特性、西藏的生態環境。為了保護這些，他要到世界各地奔走，呼籲這是他的責任。所以你說達賴喇嘛是什麼一個人，用他的這三個職責來形容的話，最好不過了。

**寶申：**那麼達賴喇嘛就像您所說的在2011年是基本上全

職退休了，但是他現在還是西藏的事務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他現在幾次訪問美國還有訪問其他國家，每次來中國官方都指責他分裂祖國的活動，您談一談他訪問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其他國家是做一些什麼事情？

**才嘉：**過去六年多的時間，我是跟隨達賴喇嘛去世界各地，他的訪問基本都有跟隨，跟隨他的行程。所以在這麼多的行程計劃裡面，我看到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一些大學裡面演講，然後就是對民眾的公開的演講（Public Talk），接見一些不同層次的，包括跟科學家的對話，包括跟知識分子的一些論壇。那這個議題啊，基本上我剛剛提到的，他就是提到人類的責任心，然後就是宗教之間的對話，他從來沒有談到任何政治，包括西藏問題。當然，有的這個大學裡面演講的時候，演講的是相關的一些問題，但是有的人提出來一些西藏的問題的時候，因為提問者這樣提，他把他知道的告訴他們。除了這個之外，比如美國、歐洲之外，我們去年也去了墨西哥，也去了拉脫維亞，也去了蒙古，這些比較不一樣的國家。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達賴喇嘛都是在宣揚他對人類的這種愛心、宗教的和諧，當然去了蒙古跟這些國家，有些佛教徒的國家，他會安排一些佛法的課程，兩天、三天，這是講法，他沒有談到任何的政治問題。對。

**寶申：**好，非常感謝才嘉先生接受我們的採訪，也請您向達賴喇嘛轉達我們的致意。

**才嘉：**謝謝你，謝謝。

-----上接19页

何具實質意義的結果，造成西藏境內外人民對此的容忍和希望程度減少，進而對「中間道路」產生疑慮，主張尋求新的解決途徑的人也越來越多。

基於2008年的特別大會對「中間道路」政策以絕對多數的認可，以及西藏人民議會於2010年3月20日以一致通過決議的方式表達的支持，流亡藏人組織仍在充滿信心地繼續推行這一政策。由於西藏境內的嚴峻現狀以及中國當局的所作所為，一些人感到忍無可忍而失去耐心等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從長遠和總體的角度而言，「中間道路」的政策已經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因此，向人民再次介紹這一政策的實質、產生過程和成果在當前是必要的。

## 二、「中間道路」政策的理念基礎

達賴喇嘛尊者基於慈悲的宇宙責任，以及任何紛爭都應通過對話的方式尋求解決的理念，認為充滿戰爭與衝突的二十世紀已成過去，主張二十一世紀應該成為一個

以和談解決紛爭的新世紀。達賴喇嘛在1984年的三・十講話中指出：『不論發展程度或貧富的懸殊，這個世界所有的國家、社群、鄰裡、乃至於一個家庭的成員，所有人類都是需要相互依存的。要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尋求快樂，避免痛苦，為了實現如此的夢想，我們必須建立起慈悲與愛心，以及最基本的正義感。唯有在如此的氛圍之下，才有可能自然地化解大至國家、小至家庭的紛爭或問題。也唯有如此，全體人類才能和平安寧地共存。』正如達賴喇嘛向世人教導的那樣，尊者在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也遵循了這一主張。顯然，尋求獨立就無法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和談，通過協商妥協以尋求解決問題，則必須要遵循互利雙贏的立場。

### 三、「中間道路」的實質

為解決西藏問題而提出的「中間道路」政策的實質是以恢復西藏的獨立地位並從中國分離為一端，維持目前的西藏現狀為另一端，捨棄這兩個極端而尋求解決西藏問題，即為「中間道路」政策。「中間道路」政策絕不可能放棄的核心精神是：合理解決西藏問題，則必須名副其實地完整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規定的相關自治權利；西藏民族必須置於同一自治機關的管轄範圍內；實現這些訴求的方式只能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至於西藏歷史，由於已發生的事情無法重新做出改變，因政治原因而曲解歷史亦難於接受，但在未來尋求和解的過程中避免因歷史原因造成負面障礙，則是「中間道路」政策的特點。

### 四、堅持「中間道路」政策的理由

(1) 當今世界，已經是一個任何政策都要適應實際情況，不得不遵從現實主義的時代。

(2) 現實是，只考慮本國權益的時代正在終結，正如歐洲國家為加入歐盟等以共同利益為主導的共同體而捨棄許多主權權益一樣，現代世界無法孤立生存，必須相互依存的情勢是至為明顯的。

(3) 很多國家都有根據民族、語言、文化等因素而實行高度自治的地區，這些地區不僅生存狀態良好，而且對國家版圖的統一和穩定發揮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4) 西藏民族人口不過六百餘萬，歷史上康區和安多的不少地區因遭蠶食而脫離噶廈頗章政權的有效管轄範圍；1951年西藏喪失獨立之時，西藏政府的控制區只限於目前所謂西藏自治區的範圍；因此，即使根據歷史恢復主權獨立，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處於這個範圍以外。故不論從長遠或眼前而言，與其尋求西藏部分地

區與中國分離，不如尋求整個西藏民族統一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更為有利。

(5) 西藏地處內陸，經濟與物質發展、提高現代文明等都需要依賴週邊強國。因此，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內具有外在物質的利益。

(6) 在國際社會為解決西藏問題而持續展開大規模的活動，不僅必須要得到各國政府和團體的支持，而且在西藏問題未獲得解決之前，西藏流亡組織的持續存在也是必須的。

(7) 尤其是必須要設法改變西藏傳統文化、生態環境和民族特性等正在面臨徹底毀滅的嚴峻情勢。

諸多理由，不再一一陳述。

### 五、「中間道路」是通過民主程序確立的政策

(1) 「中間道路」的政策雖然是達賴喇嘛的觀點，但並不是由達賴喇嘛獨斷決定的。而是根據民主機制，與當時的西藏人民議會、噶廈等民意代表和團體進行討論協商後，共同做出決定後實施的。與中國政府多次進行會談後，基於需要提出全面的議案，達賴喇嘛於公元1987年在美國國會提出了具有遠景性的五點和平建議隨後為了對五點建議進行具體闡述而於1988年在歐洲議會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建議」。

由於這是第一次對「中間道路」的政策做出具體的闡述，因此在公佈之前，由噶廈出面，邀請會議員、政府公務員、非政府組織和團體、獨立機構、新近流亡之難民代表以及特邀人員等民意代表，於1988年6月6日至9日在達蘭薩拉召開為期四天的特別會議，共同對議案進行了徹底的討論，並獲得一致的通過。因此這不僅是政府和議會，而且也是直接面向足以表達民意的各界代表徵求意見後，通過民主機制首次共同做出的決定。

(2) 由於藏中和談於1993年中斷，達賴喇嘛分別於1995年、1996年的三・十講話中都提出了就西藏未來應採取何種立場等問題進行全民公決的意見。噶廈和議會共同推動全民公決的前期作業，提出不同的四種立場選擇供人民進行廣泛的討論，結果有超過六成四的境內外人民提出避免進行全民公決，至於是否繼續秉持「中間道路」的政策，則由達賴喇嘛審視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而隨時相應地做出決斷的意見。基於此，西藏人民議會於1997年9月18日一致通過決議，要求由達賴喇嘛審視國際國內的局勢，隨時相應地做出決斷；達賴喇嘛所做出的任何決定，都等同於通過全民公決做出的決定。

由於人民的多數意見和議會一致通過的決議內容，達賴喇嘛在1998年的三・十講話中宣布將繼續遵循「中間道

路」的政策。這是根據人民的多數意見和議會一致通過的決議，以民主機制再一次做出的決定。

(3) 從2002年中藏恢復直接接觸以來，雙方雖進行了七次的和談，卻未取得實質成果，加上2008年西藏全境爆發巨大規模的和平抗議活動，流亡社會亦能感受到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根據《西藏流亡憲章》第59條的有關規定，於2008年11月17日至22日在達蘭薩拉召開了為期六天的特別代表大會，根據近六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代表所提交的書面意見、以及從西藏境內收集的意見，其中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內容都是支持「中間道路」的。這是通過直接民主的方式對「中間道路」政策第三次做出確認。

(4) 2010年3月20日，西藏人民議會在討論對達賴喇嘛信函致謝的決議文時，再次一致通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決議。這是通過民主機制第四次、也是最新一次對「中間道路」的政策做出確認。

如此，從1974年到2010年的三十六年間，達賴喇嘛不斷地一再徵求人民的意見，而人民也始終如一地自由發揮自己的智慧，以絕對多數表達了對「中間道路」政策的支持。特別要指出的是，「中間道路」獲得了多年來真誠關心和支持西藏民族自由事業者以及為此而努力的西藏三區的學者們巨大的支持。

## 六、對「中間道路」政策中的一些細節內容的調整

從1979年到1988年間的接觸和談過程中，除了表明不尋求獨立，要求自治的立場表述而外，並無具體的闡述。在1988年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議」中，提出了整個西藏三區建立在基本憲法之上的自治民主政體，除國防和外交以外，其他所有西藏事務均屬地方自治機構的權限，以及此種自治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處等內容。

中國政府指責「斯特拉斯堡建議」是尋求獨立、半獨立或變相獨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曲解，是否定中國的主權和西藏做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當時的中國總理趙紫陽對記者說：「如果達賴喇嘛想要回國，就要停止西藏獨立的活動。但看不到有跡象顯示他準備這樣做。」（意譯）中國駐新德里大使館在1988年9月21日給噶廈的回覆中稱：「斯特拉斯堡建議」並未放棄獨立的立場，因此不可能作為雙方和談的基礎。此回覆內容並於9月22日對外做了公佈。1988年11月18日，中國駐新德里代表重申：「中央再次申明，「斯特拉斯堡建議」絕不可能成為和談的基礎，和談只能在表明維護祖國的統一的前提下進行。」（意譯）

基於中方多次表明「斯特拉斯堡建議」不能成為和談基礎的立場，達賴喇嘛於1991年在三·十講話中表明：「如果在一定期限內仍未得到中方的正面回應，則將不再

受建議內容的約束。」1992年，達賴喇嘛在當年的三·十講話、以及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均公開宣布「斯特拉斯堡建議」自動失效。

自1992年宣布「斯特拉斯堡建議」失效以後，一直到2008年為止，對「中間道路」的政策沒有再做出新的闡釋。

從2002年開始進行的七次和談過程中，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組織根據國際情勢、中方立場和藏人的實際意願準備做出讓步，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範圍內尋求解決西藏問題，這些立場不僅在達賴喇嘛的三·十講話和噶廈的講話中有明顯表述，而且在和談中也向中方做了明確說明，指出一旦時機成熟，達賴喇嘛準備對「中間道路」做出更詳細的闡述。

2008年第七次會談中，中方代表提出希望了解我方對自治的認知詳情。據此，我方在意見書中詳細闡述了在整個西藏民族中真正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相關規定，以及尊重西藏民族同一性、藏人意願和藏人基本的自治權利等十一項內容；也談到藏人要處於統一行政管理下、以及自治的實質和架構、未來發展方向等內容。

「建議」與「斯特拉斯堡建議」有很大的差別，因為「建議」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相關規定，以謀求整個西藏民族處於同一行政管理下為主軸。

由於中國政府對「建議」做出了一系列的曲解，我們為此做了進一步的詳細闡釋，並於2010年1月26日舉行第九次會談時將闡釋文交給了對方。這兩份文件是對「中間道路」政策最為詳盡的闡釋文件。

在國際社會，許多國家的政府、議會、團體和個人都認為「建議」表達適當合法而表示讚賞，對中國政府竟然不予接受感到難以理解，認為不合情理而提出批評，並鼓勵我們在「建議」的基礎上繼續爭取和談成果。

## 七、實踐「中間道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以互利為原則的「中間道路」政策，取得了許多偉大的成果：

(1) 藏中之間於1979年建立聯繫後，代表團和參觀團得以前往西藏的許多地方，使境內外藏人恍若隔世重逢，從而鼓舞了境內藏人的信心和勇氣。

(2) 境內外藏人獲得探親往來的機會，尤其是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僧侶在流亡社

會獲得接受教育和傳承法脈的機會。

(3) 流亡中的各教派領袖、格西和學者得以返回西藏，從而展開宏揚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宏大事業。

(4) 贏得境內許多西藏知識份子對西藏流亡組織立場的支持和認同，如仍在世的西藏老一輩共產黨員平措旺傑就指出：『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只尋求名副其實自治」的「中間道路」，在現代歷史條件下，表現了對西藏及全體西藏民族的根本利益、及其前途和命運的慎重思考，以及知己知彼，對時局做出切實慎重考量後認真負責的態度，是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的想法。』（意譯）另一位學者也指出：『「中間道路」是藏人高興，漢人放心的雙贏(甚至多贏)創意，是唯一能夠徹底解決西藏問題且具可行性的主張。尤其是從國內藏人的角度而言，「中間道路」擺脫了統獨之爭的困境與疑惑的藩籬；從理論和思想的角度而言，「中間道路」解放了群眾性、自力性和創新性的發揮；從實踐領域而言，「中間道路」擴展了發展領域，使具體內容更加豐富。』（意譯）

(5) 「中間道路」獲得了眾多熱愛正義的漢族知識份子、民主人士、媒體和文字工作者的支持，他們並且為解決西藏問題而投身其中。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公開發表《聯邦制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途徑》《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中間線路是解決民族矛盾的良方》《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正确路線》《中間道路是金箴》等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章。在近幾年出現的九百多篇中國知識份子支持西藏的文章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支持中間道路的。於此同時，也促進了與廣大漢族人民的友誼和理解，許多地方都成立了漢藏友好協會。

(6) 達賴喇嘛在全球開展其政教利他的事業時沒有了障礙。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西藏流亡組織在國際社會發揮主導的作用，從而集中了力量。

(7) 自施行「中間道路」政策以來，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獲得了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在內的眾多獎項和榮譽，不論與國家領導人會晤、或在議會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以及建立支持西藏組織等，在各國政府和議會中所獲得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

(8) 在國際社會，流亡藏人組織以及推展解決西藏問題的活動不僅沒有政治或法律的限制困擾，而且許多政府還關注漢藏和談，為使和談產生實質結果而願意置身其中的現象也越來越多。

(9) 由於許多政府都認識到「中間道路」政策以及和談進程是尋求和解共存的思維意願，因此儘可能地為合理

解決西藏問題而提供助緣。如美國總統布什在達賴喇嘛榮獲國會金質獎的儀式中指出：『我要繼續要求中國政府應歡迎達賴喇嘛到北京，屆時將會體認到他是一個充滿和平與寬容自性的好人』。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白宮發言人指出：『奧巴馬總統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思想、和平非暴力、以及繼續與中國政府尋求和談的信念表示贊賞。』台灣總統馬英九公開表示支持西藏的自治以及達賴喇嘛尋求與中國和談的立場，他說：『這是化解西藏問題的唯一途徑。』

(10) 通過多次的和談，對中國政府的疑慮、顧忌和立場等有了明確的認知。

(11) 彰顯了我方的所有訴求都是符合實情的，因此也就有力地向國際社會證明了西藏人民的意願是合情合理，合法且適宜的。反之亦彰顯了中國政府的無理立場與頑固的真實情況。

(12) 由於提出《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從而為未來的和談確立了基礎。如此等等，諸多成果，難於一一陳述。

## 八、對流亡藏人的一些期望

自西藏高原形成以來，西藏就一直是個發展出燦爛文化的國家，回顧西藏最強盛的三法王時代，所有的發展和榮耀都源自於民族的勇敢精神和內部的團結。從公元九世紀開始，西藏的團結精神趨於衰退，內部衝突導致西藏幾百年的分裂，其後又被蒙古征服，恢復自由後，西藏先後經歷了薩迦王朝、帕竹王朝、仁蚌巴時代、藏巴王朝等。由於當權者不能推行平等政策，人民內部不能團結一致，造成改朝換代頻繁，國力難以奠定。噶登頗章政權建立後，雖稍有改善，但由於大臣內部相互傾軋，引發地區衝突等，從而引來外力的覬覦和涉入。到十九世紀時，西藏的權力輪廓已經越來越黯淡模糊，乃至於至今仍不能完整呈現，其唯一根源就是統一團結力量的衰敗。有一個現代學者指出：『元素紊亂使身體功能衰弱，疑惑煩亂讓次第功德退落，酋長相互爭鬥使西藏衰敗，一切衰敗皆因內部的錯亂，』真可謂是一針見血。因此，不論是長遠或眼前的利益，西藏民族都只有團結一致才能達成，此點洞若觀火，至為明顯。

目前，由於十四世達賴喇嘛平等無別的偉大事業、以及民主自由制度的確立，加上中國政府暴力鎮壓所造成的嚴峻情勢等因素，西藏社會出現了不分教派和地域，彼此間聯繫更加密切統合的可喜局面。但僅僅如此顯然還不夠，尤其是對方陰險的壓力會更大，對可能面臨的破壞團結的伎倆和前所未有的危險性絕不能等閒視之。過去五十年來，達賴喇嘛領導的流亡藏人組織基於對民主原則和製度的信念和忠誠，西藏人民的任何立場和觀

點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並創造了自由創新、發展和組織的機會。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政治主張只會莊嚴和豐富文明，不會影響民族的統一。而在流亡社會，由於存在著對方以各種政治理念為幌子進行分化破壞的危險性，因此，想做出兩點重要的說明和呼籲。

第一，在民主社會，不同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可以進行激烈的爭辯，但這並不會危害到統一，其原因是不同觀點的人們懂得相互尊重、理解和寬容，這是基於理智地看待立場觀點。因此，西藏人不論持何種政治主張或理念，一定要有理性的思維分析和明確的自我觀點認知，不能盲聽盲從，不能有迷信、偏執、愚昧輕信或盲從他人等。有自己的主見而不輕易盲從是至為重要的。例如，達賴喇嘛無論發表任何政教言論，都從未要求人民必須接受或服從。正如如來佛祖教導的『比丘或智者，當善觀我語，如煉截磨金，信受非唯敬』，達賴喇嘛即使經過教言理路、釋例察原等方式認證而確信的問題，在做出教導時，也都會鄭重地要求所有受眾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究出正確的認知，而不要因為是達賴喇嘛的觀點或說法而盲目信從。

因此，對「中間道路」的政策，達賴喇嘛也是以理服人，除了表明這是最好的政治前途選擇而外，從未強令人民服從。流亡藏人組織也從未以任何方式或途徑做出過這樣的指示或努力，而且未來也絕不會這樣做。同樣，任何支持「中間道路」政策的個人或團體，如果為了宣傳所認同的政策而宣稱這是達賴喇嘛的主張，因而必須支持，則這種說法絕對是歪理邪說，是不能接受的。如上所述，「中間道路」的政策雖然是經過民主程序一再確定的結果，但這一政策最初由達賴喇嘛提出，至今仍由達賴喇嘛繼續推動的事實，是可以、而且也應該向人民說清楚，但絕不應該有據此施加壓力的因素存在。

因此，希望任何認同、支持或實踐「中間道路」政策的個人或組織，一定要運用自己的智慧，通過深入研究，自由地作出判斷。不能因為這是達賴喇嘛的主張就盲目信從，在宣傳推廣的過程中也要如此說明。

第二，那些立場和觀點與「中間道路」政策不同的個人和組織，也完全可以自由地推介和傳播自己的立場觀點，絕不會有任何的限制。但不應該將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推介不出去的原因歸咎於西藏流亡組織的壓力，或以如傳播獨立理念就會被攻擊是背叛達賴喇嘛等說辭進行曲解，傳播這些毫無根據的胡言亂語。人民也不要被這些言詞所迷惑；在通過民主程序確定「中間道路」政策的過程中，那些持其他主張或理念的人其實得到了更多的宣傳機會，未來對類似機會的把握也不會有何障礙。不能因為自己的理念無力吸引人民就批評人民，攻

擊接受達賴喇嘛理念的的人民是「迷信」「不會獨立思考」「不負責任」等，這是對人民不敬的言論，也是自己沒有承擔的表現。在民主社會，選擇信賴誰、追隨誰或接受什麼理念等是最基本的自由，誰也不能對此說三道四；是否信賴達賴喇嘛是個人的自由，這種支持的自由也是不可剝奪的，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和平等的界線是非常清楚的。

另一個很不恰當的行為是，一些追求獨立的組織和個人，假裝達賴喇嘛實際上是認同或支持他們的樣子，歪曲宣稱達賴喇嘛由於慈悲或不方便說話才如此如此等，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謊言。

一些人甚至非常過分地宣稱「中間道路」並非議會確定。議會決議明確宣示：達賴喇嘛所做的任何決定，其地位等同於通過全民公決做出的決定。從而宣布了對「中間道路」的支持立場。2010年3月20日全體議員一致通過的決議中，除了重申之前通過的決議內容，還宣布議會將會堅定地支持達賴喇嘛做出的任何決定。眾所週知的是，在議會，除此而外並沒有其他更高形式的決議支持方式。

因此，那些持不同於「中間道路」政策的團體和個人，在明瞭民主制度下的自由限度與責任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向人民推廣自己的觀點和見解，而不應做無根據的指責、蔑視戲弄基層人民等不堪的事情。同時，觀點理念也不應一直停留在崇尚、呼喊口號或向媒體發表宣言等的層次上，對理念的實施方法、過程計畫、尋求支持等做出詳細明確的規劃，從而贏得支持是最好的。

## 九、結尾

達賴喇嘛所主張的「中間道路」政策，是由境內外的西藏人民通過完全民主的程序和方式多次予以認可確定的政策，也完全符合民主的原則。任何時候，人民只要改變了自己的意志，西藏流亡組織除了完全接受而外，絕沒有任何堅持己見，或是強迫人民接受某一政策的想法。支持和認同「中間道路」政策者，其認同和實踐應該是基於理性思考和完全了解政策的情況下做出的判斷，反對者也應通過理念和正義的途徑，而不是發表沒有根據的言論，或利用人民焦慮的心態等。以上為噶廈的期望。

~~~~~

**西藏通訊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官方期刊，欲了解更多有關西藏的詳細信息，請登錄以下網址：**

[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www.tibet.net](http://www.tibet.net)

[www.tibetonline.tv](http://www.tibetonline.tv)

[www.middlewayapproach.org](http://www.middlewayapproach.org)

## 與桑東仁波切談中間路線 - 達蘭薩拉觀訪筆記

文/胡平

今年3月，我和蘇曉康應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貢嘎扎西先生之邀，前往印度的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社區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參觀訪問。我們拜會了達賴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官員與議會會長，參觀了兒童村、學校、寺院、藏醫藥研究所，難民接待中心和圖書館，博物館，和藏人的人權與民主中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舉行座談，還在選舉日即20日那天，前往投票場所觀看了藏民的投票選舉等等。這裡，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和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的交談。

桑東仁波切今年72歲了，出生於雲南迪慶，5歲那年被認定為四世桑東仁波切的轉世靈童，7歲受戒，12歲開始學習佛學。1959年3月，他隨同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在途中，達賴喇嘛任命他給隨眾僧侶當老師，那時他才20歲。桑東仁波切對藏族文化，宗教和歷史都頗有研究，梵文功底相當深厚，曾獲得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擔任印度瓦納拉斯西藏文化學院院長和高級顧問近30年，是國際公認的藏學大師。桑東仁波切是西藏民主先驅，他是第一部“西藏流亡憲章”起草人之一，擔任過達賴喇嘛辦公室秘書長，議會議員和議長，2001年當選為第一任民選首席部長，2006年連任，到今年兩屆任滿，即將退休。

會談是在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的會客室進行的。桑東仁波切身穿絳紅色袈裟，神態儒雅，舉止莊重。我們的交談從一開始就直奔主題。

蘇曉康問道，據說有不少藏人主張獨立，現在達賴喇嘛宣布退出政治，議會要改選，首席部長也要改選，民主就是要遵從多數人的意見，那麼，在今後，達賴喇嘛倡導的中間路線會不會改變呢？

桑東仁波切明確回答：不會。桑東仁波切說，主張獨立的藏人是少數，多數藏人是支持中間路線的，這次三位競選首席部長的候選人就都主張中間路線，因此，不論誰當選，都會繼續中間路線。桑東仁波切說，他認為至少在今後十幾二十年內，中間路線都不會改變。

我提出，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是務實的，可行的，如果改成要求獨立，那很可能會導致藏人在國際上活動空間的萎縮。現在，達賴喇嘛訪問美國，和美國總統見面，訪問德國，和德國總理見面。中共當局抗議，指責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西方政府首腦理直氣壯地反駁，說達賴喇嘛不是分裂分子，達賴喇嘛是主張真正自治，他們還可以反過來呼籲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對話，認真落實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藏人放棄中間路線了，改成主張

獨立了，而西方各國政府都是承認北京政府的，都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那麼，他們還方便和達賴喇嘛會見嗎？

桑東仁波切表示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說流亡政府對中間路線有深入的討論和共識。

我接著說，在中共一黨專制下，西藏獨立不可能，真正的自治也不可能。只有在結束一黨專制，民主轉型後，西藏才可能實行真正的自治。到那時，藏人會不會要求獨立呢？

桑東仁波切說，既然在現在我們都主張自治，主張留在中國，主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解決問題，到了民主轉型時自然更不成問題。

我覺得桑東仁波切的回答合情合理。我又做了一些補充。我說，伴隨著民主化，很多原先被壓制的矛盾和問題可能會浮出水面。也許，有些藏人會要求獨立，而有些漢人會熱衷於大一統而不惜使用武力。如果雙方都急於實現自己的主張，那就有可能導致嚴重的衝突。

溫和派可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無力主導大局，強硬派則可能訴諸武力，弄不好還可能給反民主的力量提供藉口捲土重來。因此，我們的主張，一是要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二是要規定一個過渡期，緩衝期。在這段時期，一方面鞏固自由民主，一方面加強各族各地區人民的對話和溝通，增進彼此的了解，消除誤會與隔閡。這才有利於我們用和平的方式，找出一種能讓各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桑東仁波切對我的觀點表示贊同，尤其對我強調用和平方式處理爭端這一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在這次會見中，蘇曉康還對達賴喇嘛退出政治以及流亡藏人社區建設等問題和桑東仁波切交換了觀點，桑東仁波切則徵詢了我們對中國大陸政經形勢的看法。

通過這次交談，我對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更有信心。達賴喇嘛多次表示，他對中國政府越來越不抱希望，對中國人民越來越抱希望。有人說，中間路線推行這麼多年，毫無進展。這話不對。因為中間路線的主張，並不只是講給中共當局聽的，更是講給中國民眾聽的。近些年來，由於各方人士的推動，特別是過去兩年多達賴喇嘛的親自推動，漢藏對話取得了非常積極的效果。正如桑東仁波切早就講過的那樣：藏漢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和睦相處，作為鄰居，將來不可能由於一些政治問題而分離，成為仇敵，我們還是要一起存在下去。

# UMAYLAM 中間道路

## འབྲུག་གི་ལོ་ལོ་ལོ་ལོ་ Middle Way Approach

*Peaceful conflict resolution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採取行動：加入『中間道路』運動！

幫助我們通過非暴力、對話和名副其實的自治為西藏恢復自由，成為『中間道路』運動的一份子。

『中間道路』代表藏人以和平可持續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官方立場。這一政策同時也是尊者達賴喇嘛的立場。

### 線上宣傳

在臉書 (Facebook)、推特 (Twitter) 及其它社交媒體上點“贊”，“分享”和“評論”。

當您分享有關『中間道路』的信息時，請確保包括 #middleway、#umylam、

#中間道路等標籤，以及以下網站：[mwa.tibet.net](http://mwa.tibet.net)

鼓勵他人“分享”臉書和推特上的文章。

在您的博客上寫有關『中間道路』及現今西藏的文章。

### 媒體宣傳

鼓勵您當地的媒體撰寫當地藏人的故事，並將『中間道路』包括到他們的故事中。

向您當地的報紙介紹『中間道路』及其以非暴力解決衝突的原則。請確保包括以下鏈接：[mwa.tibet.net](http://mwa.tibet.net)

### 政治宣傳

聯繫您當地的國會議員，並向他們介紹藏人行政中央的立場：『中間道路』。

### 社區宣傳

向您的親朋好友介紹『中間道路』。

在您當地的社區組織（比如：教會，扶輪社）介紹西藏目前的情況以及藏人尋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衝突的『中間道路』政策。

在您的社區舉辦各種活動來向他人介紹西藏及『中間道路』政策，之後組織討論會或問答環節。邀請嘉賓並放映有關『中間道路』的影片。（可在本網站首頁及[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上找到相關影片）

### 藏人及廣大西藏支持者

在大型聚會上介紹『中間道路』政策。

通過熟知世界各地其它自治區域、學習《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及《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闡釋，從而加深對『中間道路』政策的理解。

安排圓桌會議、演講、培訓課程等活動向社區成員、朋友介紹、討論西藏問題。

### 向華人宣傳

解釋『中間道路』政策並讓他們參考[mwa.tibet.net/cn](http://mwa.tibet.net/cn) 的中文網頁。

強調『中間道路』政策的重要因素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名副其實的自治，“藏人的11項基本需求”等。